

编者说明

我们编选的这本《毛泽东哲学思想资料选辑》，是为了适应教学 and 研究的迫切需要，作为内部学习、教学和研究之用的。

本资料选编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以外的毛泽东同志的部分文章、讲话、书信和题词及其他有关资料。选文都是解放前后的书刊上公开或内部发表、出版过的。选用的文章，除个别明显的错字加以改正外，都保持其原貌。为了便于读者查找，注明了选文的出处，引用时请核对原文。选文中个别标题是编者加的。

我们把周恩来同志的《学习毛泽东》一文，作为本书的代序。

本资料由宋一秀、孙克信、苏厚重主编。参加编选工作的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于良华、王子恺、王桂英、冯国瑞、许全兴、张文儒、陈葆华、陈战难、陈荣冠、杨梅叶、邱建新、胡子宗、徐素华、魏俊章等同志。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资料不全，因此，选文上的不妥和遗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
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研究室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目 录

代序 学习毛泽东.....周恩来	(1)
读《明耻篇》后题词(一九一五年)	(12)
体育之研究(一九一七年四月)	(13)
民众的大联合(一)(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24)
民众的大联合(二)(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27)
民众的大联合(三)(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32)
给陶毅的信(一九二〇年二月)	(36)
给周世钊的信(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39)
周世钊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八 日)	(43)
为易礼容的信加的按语(一九二〇年七月)	(44)
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	(45)
给肖子璋的信(一九二〇年×月)	(47)
肖子璋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二 十二日)	(48)
给欧阳泽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9)
欧阳泽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一九二〇年五月二 十二日)	(50)
给张国基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52)
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54)
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	(56)
给向警予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57)

向警予给彭璜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 二日）	(58)
给罗荣熙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59)
罗学瓚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60)
给罗学瓚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2)
罗学瓚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 日）	(65)
罗学瓚给毛泽东蔡林彬肖子璋的信（一九一九 年十一月十四日）	(69)
给罗璈阶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72)
罗璈阶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 日）	(74)
给李思安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76)
李思安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77)
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一九二〇 年十二月一日）	(78)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 日）	(86)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90)
肖旭东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	(95)
给蔡和森的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104)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105)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一九二一年一月）	(114)
北京政变与商人（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139)
“省宪经与赵恒惕”（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142)
纸烟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144)
英国人与梁如浩（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146)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节录)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48)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149)
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153)
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	(156)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节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158)
反对本本主义 (一九三〇年五月)	(182)
东唐等处调查 (节录)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190)
木口村调查 (节录)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	(191)
兴国调查 (节录) (一九三〇年十月)	(192)
寻乌调查 (节录) (一九三〇年五月)	(195)
今年的选举 (节录) (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197)
长冈乡调查 (节录)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197)
才溪乡调查 (节录)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202)
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 (一九三四年四月)	(205)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	
十日)	(207)
辩证法唯物论提纲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	(208)
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八年初)	(245)
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一九三七年九月)	(246)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 (一九三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	(253)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一九	
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254)

《农村调查》序言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255)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256)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一九三七年
十月二十三日） (259)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 (259)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
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
日） (264)

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一九三八年五月
四日） (268)

和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付
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一九三八年
七月二日） (269)

学习毛泽东*

代 序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周 恩 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

* 这是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

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

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有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

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那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主席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放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

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

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象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就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量的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

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

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的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

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象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

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

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1—343页）

读《明耻篇》后题词

（一九一五年）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选自杨开智：《粪土当年万户侯——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断》，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怀念毛主席》第二辑第16页。）

注：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卖国贼袁世凯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袁世凯竟加以承认，由此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公愤。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同志极为愤慨，当即在一本名为《明耻篇》的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篇题词。

体 育 之 研 究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新体育》杂志编者前言：《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的一篇著作，原载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杂志，署名为“二十八画生”。一九五八年三月，本刊曾以原署名全文发表。现在，在第四届全运会的前夕，应读者要求，本刊重新刊登此文。

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提倡体育，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就体育的意义、作用，体育与教育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当时的见解，是我国现代体育事业初期发展中一篇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献。

文章发表于“五四”运动前的一九一七年春，是用文言写的，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我们加了新式标点，作了一些注释，……。

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今之提倡

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云何，著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知海内同志同此病而相怜者必多，不自惭赧，贡其愚见，以资商榷。所言并非皆已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倘辱不遗，赐之教诲，所虚心百拜者也。

第一 释 体 育

自有生民以来，知识有愚暗，无不知自卫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饥极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咽，巢木以为居，皮兽以为衣，盖发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食饔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由此言之，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 体育在吾人之位置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已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饬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第三 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

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

倮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痊。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学校既起，采各国之成法，风习稍稍改矣。然办学之人犹未脱陈旧一流，囿于所习，不能骤变，或少注意及之，亦惟是外面铺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受亏；其余类此者尚多，不能尽也。

然则为吾侪学者之计如之何？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第四 体 育 之 效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

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动而已。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益有必至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诗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今之伍秩庸先生七十有余岁矣，自谓可至百余岁，彼亦用思想之人也；王湘绮死

年七十余，而康健矍铄。为是说者其何以解邪？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

非第增知识也，又足以调感情。感情之于人，其力极大。古人以理性制之，故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又曰“以理制心”。然理性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多困于一偏之情，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以例言之：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待也。

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

先驱也。

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驰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第五 不好运动之原因

运动为体育之最要者。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其原因盖有四焉：一则无自觉心也。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人多不知运动对于自己有如何之关系，或知其大略，亦未至于亲切严密之度，无以发其智，因无以动其情。夫能研究各种科学孜孜不倦者，以其关系于己者切也，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而运动则无此自觉。此其咎由于自己不能深省者半，而教师不知所以开之亦占其半也。一则积习难返也。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虽知运动当行之理与各国运动致强之效，然旧观念之力尚强，其于新观念之运动盖犹在迎拒参半之列，故不好运动，亦无怪其然。一则提倡不力也。此又有两种：其一，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予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其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一则学者以运动为可羞

也。以愚所考察，此实为不运动之大原因矣。夫衣裳襜褕、行止于于、瞻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故有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一言蔽之，害羞之一念为之耳。四者皆不好运动之原因。第一与第四属于主观，改之在己；第二与第三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第六 运动之方法贵少

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有老者年八十犹康健，问之，曰：“吾惟不饱食耳。”今之体操，诸法樊除，更仆尽之，宁止数十百种！巢林止于一枝，饮河止于满腹，吾人惟此身耳，惟此官骸藏络耳，虽百其法，不外欲使血脉流通。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百法之效亦然，则余之九十九法可废也。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筋骨之锻炼而百其方法，是扰之也，欲其有效，未见其能有效矣。夫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者不同。浪桥所以适于航海，持竿所以适于逾高，游戏宜乎小学，兵式宜乎中学以上，此应诸方之用者也。运动筋骸使血脉流通，此锻一己之身者也。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近之学者多误此意，故其失有二：一则好运动者以多为善，几欲一人之身，百般俱备，甚至无一益身者；一则不好运动者见人之技艺多，吾所知者少，则绝弃之而不为。其宜

多者不必善，务广而荒，又何贵乎？少者不必不善，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明乎此，而后体育始有进步可言矣。

第七 运动应注意之项

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凡静者不能自动，必有所以动之者，动之无过于兴味。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兴味，而于运动尤然。人静处则甚逸，发动则甚劳。人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而变其好恶之心。而此兴味之起，由于日日运动不辍。最好于才起临睡行两次运动，裸体最善，次则薄衣，多衣甚碍事。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每次不必久，三十分钟已足。如此自生一种之兴味焉。第二能生快乐。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亦缘有恒而得也。快乐与兴味有辨：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二者自异。

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心在鸿鹄，虽与俱学，勿若之矣。故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着吃饭，穿衣则想着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虽然，非所以语于运动也。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

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他所当注意者尚多，举其要者如此。

第八 运动一得之商榷

愚既粗涉各种运动，以其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乃提挈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凡分六段：手部也，足部也，躯干部也，头部也，打击运动也，调和运动也。段之中有节，凡二十有七节。以其为六段，因名之曰“六段运动”。兹述于后，世之君子，幸教正焉。

一、手部运动，坐势。

1. 握拳向前屈伸，左右参，三次（左右参者，左动右息，右动左息，相参互也）。
2. 握拳屈肘前侧后半圆形运动，左右参，三次。
3. 握拳向前面下方屈伸，左右并，三次（左右并者，并动不相参互）。
4. 手仰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5. 手复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6. 伸指屈肘前刺，左右参，三次。

二、足部运动，坐势。

1. 手握拳左右垂。足就原位一前屈，一后斜伸，左右

参，三次。

2. 手握拳前平。足一侧伸，一前屈。伸者可易位，屈者惟趾立，臀跟相接，左右参，三次。

3.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揭，左右参，三次。

4.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前踢，左右参，三次。

5.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前屈，一后伸。屈者在原位，伸者易位，两足略在直线上，左右参，三次。

6. 手释拳。全身一起一蹲，蹲时臀跟略接，三次。

三、躯干部运动，立势。

1. 身向前后屈，三次（手握拳，下同）。

2. 手一上伸，一下垂。绷张左右胸肋，左右各一次。

3. 手一侧垂，一前斜垂。绷张左右背肋，左右各一次。

4. 足丁字势。手左右横荡，扭捩腰胁，左右各一次。

四、头部运动，坐势。

1. 头前后屈，三次。

2. 头左右转，三次。

3. 用手按摩额部、颊部、鼻部、唇部、喉部、耳部、后颈部。

4. 自由运动。头大体位置不动，用意使皮肤及下腭运动，五次。

五、打击运动，不定势（打击运动者，以拳遍击身体各处，使血液奔注，筋肉坚实，为此运动之主）。

1. 手部。右手击左手，左手击右手。

（1）前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2）后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2. 肩部。

3. 胸部。
4. 胁部。
5. 背部。
6. 腹部。
7. 臀部。
8. 腿部。上腿、下腿。

六、调和运动，不定势。

1. 跳舞，十余次。
2. 深呼吸，三次。

（原载《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署名“二十八画生”。现选自《新体育》1979年第8期）

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遇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者必都

有其大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条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故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

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谋借，本来人之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作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作“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做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设了军营练兵，设了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地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拿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作“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以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者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地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为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的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

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作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选自《湘江评论》第二号）

民众的大联合（二）

以小联合作基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上一回本报，已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

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小联合，有大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仇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的窗

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精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实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图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真多呢。唉！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娱快，我们不联合起来，讲究我们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们已经陷在苦海，我们要求讲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们，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扈——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

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一个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便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钱，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生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要说了！小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我们想要不做奴隶，除非联合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诸君！我们是警察，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同类，成功一个有益我们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说，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员，和警察，我们也有点感觉。

诸君！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赁钱那么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我们也有什么联合

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说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过细说来，象下列的

铁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员的联合，
电话司员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纺织业工人的联合，
电车夫的联合，
街车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级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当起而仿效别国

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选自《湘江评论》第三号）

民众的大联合（三）

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上两回的本报已说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不用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如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

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此问我直答之曰“有”。诸君不信，听我道来——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谘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谘议局乃有各省谘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及革命党和谘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谘议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织的各种团体，象

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旅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环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象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象银行公会，米业公会……），各学校里的研究会（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各种俱乐部……

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是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增加了觉悟，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象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商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上海的五十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象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纯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大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大联合”果有此能力吗？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大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時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

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选自《湘江评论》第四号）

给 陶 毅 的 信

（一九二〇年二月）

“联军”

“同志的分配”

“自修大学”

“女子留俄勤工俭学”

斯咏先生：（上略）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个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

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象“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共同的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观。“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作事的分配”。我们要想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人是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

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各方面情形，会悟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睡在鼓里，狠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什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

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

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暉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

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椿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象你曾说过杨润余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可以说大概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课，不知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给 周 世 钊 的 信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国内研究与出国 研究的先后问题

团体事业的准备工夫

自 修 大 学

惇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

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能真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们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奇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 吾人如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

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认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

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 (1) 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 (2) 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 (3) 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 (4) 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会“出洋”的瘾才对。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二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不可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立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复一信。

弟泽东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附：

周世钊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润之兄鉴：

前信想已收到。此时湘局略定，可贺！惟应建设的事，千头万绪，急待进行。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求实现素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其理由如下：（1）自修学社本有移湘之议，前因时局问题未能即行，此时当可达到初意。（2）生活问题，在湘比较容易解决。（3）湘中无健全的言论机关，如大公报、湖南日报……都不见有特色；兄如回湘，于言论尽一番力，当有很大的影响（现时我以为要有专门讨论湘省以后建设事业的报纸，造成舆论，一面促进人民自觉，一面指导政府。然而未见其报，未闻其言也）。（4）麓山自修社，现今大有可为，即兄前曾设议之新民学校，此时似亦可着手：因为易先生现已回湘也。有此四层，兄可回湘矣。闻叔衡已筹钱汇兄处作川资，不知已到否？敬祝

健康！

世 钊

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为易礼容的信加的按语

(一九二〇年七月)

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准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姐及周惇元兄函中已有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说过，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诚哉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强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济经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有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午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

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底的学者，如罗荣熙肖子璋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理想和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泽东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

主张做事要有准备

泽东：

殷柏：

今天在报纸上看见你们答曾毅的信，很满意。但刚同恽代英君谈，他批评湖南人的缺点，我也觉得很对，特就感想所及，写给你们这封信。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

宣言，后面添了一段，说“实行政治运动，还要靠热心的政治家……”，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我看了之后，就同廖焕星君说，这是他们受了刺激而转舵了，觉得要预备充分的能力，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日所提出的“主张”，似乎又较前坚强，有跃跃欲动之势。我是一个懦弱的学生，不但不能直接运动，并且说都不晓得说；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次的主张，若是不能实现，则并非理想之罪，只怪得先无充分预备。甚么是我之所谓充分预备呢？曰，你们的“同志”太少，湖南的少年界，绅士界，都很少有能力的；有亦未必尽与你们连络，你们的意见书上所说的一些事，你们到底叫谁去做？我恐怕不是时髦人物学了你们的去讨饭碗，就是给人家作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你们若是自己起来做，则谁可助力？建设的条件这么多，湖南有七十五县，一时如何布置得来叫唤得醒？若说这翻鼓吹，自有相当的效力，我也承认，不过较先有预备，取“分工作用”。能实行贯彻你们的主张，那好处就更多了。

我们到底要如何预备起来的问题，我晓得我现在所写的，一定是你们时常所想的，不过还未进行就是了。或者已经进行了，我不晓得。我觉得你们青青要回到湖南去，采取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般好同志。（中略）我是一个没有十分觉悟的人，上面的话，不过就我的直觉，推论几句，你们若以为不中肯，请将你们的计划，尽情告我，使我放心，若以为尚有采之处，则请再进一步讨论如何实行。（下略）

易礼容

六月三十晚二点四十二分在武昌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肖子璋的信

(一九二〇年×月×日)

子璋兄：

你沿途给我的信和照片，都收到，很感你的厚意，我竟没有一个信报你，很对你不住！“半淞园会议”的结果，既由你和赞周等带到了欧洲，“蒙达尔尼会议”的情形，又由你和子昇递回了亚洲，子昇并且自己回国，不日就可见面了，真足乐呵！你现在谅好，谅还在学校，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它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学会出版物分“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为二，通信集本年至少可出三集，请设法收集在法诸友间新旧信稿邮递“长沙文化书社”交弟，作第四集第五集材料，至感。（请告诸友以后通信均书长沙文化书社）

弟泽东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肖子璋给毛泽东彭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润之

两兄：

殷柏

沿途寄信，不知均到否？我们已于六月十六日晚十二时到了巴黎。子昇以为我们即由马雷分配于各地学校，知我们将到了，即去蒙达尼与和森详谈一切。待我寄信和森，他俩人才同返巴黎相见，已是十八日了，赞周已赴蒙达尼学校，我与焜甫玉生本定赴芬登不鲁，因在巴黎候子璋多住两日，至二十日，才偕、子璋、和森、焜甫、玉生来芬登不鲁 Fontainebleau 1 Collegecarnot 学校。子璋仍返巴黎，和森仍返蒙达尼。我们有十九人在此，十三人在蒙达尼，均京保旧友。其余都已分配于各地学校。留巴黎的很少了。

李和笙、贺果（二人同厂），罗荣熙、张芝圃，均在工厂作工。拟每星期后约会友在蒙达尼大会一次，详谈一切，并决议共同及分工读书做事之方针。我与焜玉，在此非长久计。

子璋在法受气不少，而进步殊多。和森在校，完全自修，法文可看报，生字不多了。李和笙听说法文也很好了。向蔡并非“订婚”，乃完全自由恋爱，有所谓“向蔡同盟”

云。

余续述，望

来信。文亮，理怡两位同此

肖子璋

九、六、二二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 欧 阳 泽 的 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

玉生兄：

共同的精神四项。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岂但县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说。是因为新民学会现在尚没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日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半淞园会议，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

度之上。

你的信我在上海接到，彭、周、劳、魏，都转给他们看了。我七月回湘，一向多忙，未能作答，幸谅！你现状谅好，我忘记你在芬丹白露，抑在蒙达尔尼来信幸告，近因积倦，游览到萍，旅中作书，言不尽意。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萍乡旅中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欧阳泽给毛泽东彭璜等的信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学会共同的精神四项 会员加入不分省界

润之殷柏转在沪各同志：

由香港寄上一片，谅收到。

我们十二日由香港开，十六日到西贡，停两日开，经两日到新加坡，停一日。到华侨中学，与涂开兴、张国基、姜心培诸君，相晤甚欢。和张君谈话独多，关于本会在沪所议定的和所进行的稍为报告他一下，并希望他在此地为本会物色些人物。

讲到新民学会，我有一个意见要提出来，这个也许曾在会章上说过的，或是在半淞园讨论过的，今都不问，把他写在下面吧。

（一）共同的精神。这是本会会员所应该注意的，共同

的精神是什么？

1. 对于本会要尽心尽力的栽培他，灌溉他，爱惜他，务使他充量的发展。却不要一心一意的专事服从他，倚靠他，更不要挟甚么野心来利用他，把他当个偶象或傀儡玩。

2. 本会对于个人，和个人对于本会，须都要负完全的责任；本会的失败，即是个人的失败；个人的失败，也就是本会的失败。

3. 会员对于会员，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任，在行为上有互相劝勉的责任。

4. 会员对于会员，须要有理性的爱，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感情的爱是暂时的，部分的。理性的爱，方是普遍的，永久的，方能维持一个团体，不至于忽尔涣散。

以上几点，因途中困顿，未暇把他详细说明出来，想也可以不必详说就可明白了。

（二）会员的加入，今所特地提出来讲的，是暂时加入会员应不应该分省界？这问题，当我和光楚泽东在北京时，曾作非正式的讨论，不过那时候以为非正式，便含糊过了。到上海，在半淞园那次，也忘记了提出来。我今觉得这点也有讨论的价值，便提出来和各同志商量商量。

毛君曾说，暂时不必加入外省的会员，他的理由大概是：外省的会员，恐怕对于本会底内容和精神，不能明晰的彻底的了解，因此对于本会没有许多益处。这话是错了。为什么呢？无论本省或外省的人，至于与本会生了关系，甚而至于要加入本会，必定是本会会员和他有长期间的周旋，对于他有精密的考察，实在见得他对于本会已经了解，并有很诚恳的表示，而后有加入为会员底结果。况经在半淞园会议底结果，关于加入会员底手续是：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

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已经是很严格的了。如果这人对于本会素不了解，已是根本的不成为会员，便不必虑及有益无益了。（上略）

欧阳泽

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于孟加拉海舟中。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张国基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会 务 问 题

湘人往南洋应采取的态度

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南洋文化

颐生兄：

两信先后奉悉，久未作复，甚歉！所言会务六项，弟大体均赞成。第一发行会报，现已决发刊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两种。第二项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项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弟忆夏间在上海与焜甫、赞周、子暉、荫柏、望成、韞厂、敦祥、冀儒、玉生等在半淞园会商，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备下列三个条件，

（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该联络）。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

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第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费用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信社组织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兄弟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会 务 讨 论

润之老兄：

我好久要写信给你。因不知道你的住所，所以拿起笔来，就把他搁置了。前日子曠，玉生，绍休诸兄往法，在此过身，我通会了，谈了很长的话。后来问你的现状，才知到了上海，万里外得到故人消息，心中格外欢喜。趁著暇时，就把我此次南来的琐事，和环境的感触，写在下面，作一个报告。（中略）

我对于学会，稍有一点意见，不妨把他写来和你商酌。

一、会务的进行。我们这个会，既是叫做学会，那么，是专门为我们研究学问，和交换知识的一个新村，现在会友有在欧洲的，有在日本的，有在南洋的，分散到这样远，怎样能够研究学问交换知识呢？我的意思，要发行一种书报，替我们做个意见的传达员，但是这种书报，不是为社会公开的，是专为我们研究学术的。要把他做非卖品，不要在社会上出风头。

二、会友的增加。会友是应该增加的，但是要十分郑重，不可随便忽略。我的意思，增加会友，纵少要有四人以上的介绍，并且要得委员长和评议部的同意。就是学问性情，亦须有一个月以上的考察。若不是这样办法，就会弄得

乱七八糟，半溲马勃，都可收罗，不算什么学会了。

三、会友的界限。我们这个会，虽是取绝对解放，和男女公开主义，但是女友还是很少，并且仍旧有几分客气，这是一个缺点，我的意思，要有真正的解放，打破一切界限，无论男、女、老、幼、本省、外省、大学生、小学生，只要他的脑筋受了这汪洋澎湃的新潮洗过，和宗旨相合，都是可邀为会友的。

四、会内的设置。应当找个一定的会所，多买书报杂志，以便会友的就阅，或借阅，保管的责任，暂请委员长或干事担负。

五、经费的救济。我们既是要办书报，又要设置会所，需经费亦定不少，会内既没有基本金，纯靠入会金和常年金来办，断不会够。所以我意，要于常年捐外，开一次特别捐，作为开办费，就是出版的书报，各人都要拿钱来买，你看可行不可行呢？

六、印刷会员录。须将现有的会员姓名，别甫，籍贯，住所，通问处，印成小册，以便常通声气。今夜时候已晚，我的话也说完了。我们到梦乡里再会罢。就此祝你的脑健。

弟张国基

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十二时在星加坡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

南洋通信社之组织

润之老兄：

好久沒有给你的信，对不起。驱张的运动，达到了目的，湘民尚存有一线生机，这是你们的功德，我不歌颂。我只羡慕你们的精神战胜了武力。（中略）

南洋通信社事，长沙有什么办法沒有？此间因涂九衢君不愿湘人南来，所以通信社事，沒人过问。今年南来湘人，将近三十（另有名单），已引起江浙人注意。最近发生一件可怪的事，就是梦想不到的《吉隆坡群益报》上，载湘人谋活动于南洋学世（另有报剪下呈阅），事实很详。我现在想邀合几个同志，把这通信社即行成立，以便后来的人，有所接洽。

李思安、肖道五二君。本月一号抵埠，李在南洋女校任事，肖亦在南洋女校代课。曾与李君说及会务，知己增加会友，甚喜。但不知此间如有相当之人，亦可以加入不可，来信希言及之。

此祝 康健

弟国基 九、九、十九

有价值的新闻报纸和新学说的书籍请寄两份

附湘人在南洋者一览表（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向警予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湖 南 问 题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暗淡。“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进步！健毫伯母及咸熙妹同此问好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向警予给彭璜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

彭黄
泽东先生：

到法后，联接好音，知在国内积极活动，湘事大有可望，行见东方瑞士，不一二年即将宣传于吾人之耳鼓，念之欢跃！和森意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后定，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此意我极赞成，不知泽东先生以为何如？我现在学习法文，除忙以外，别无可告。自出淑来，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公暇，幸时赐教言，并祈为人群社会珍重！

向警予

此间同学属致意

九年六月二日晨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罗荣熙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荣熙兄

兄此信我自接到，先后看了多次。今天再看一次，尤有感动。你的话，我没有不以为然的。我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的办法，暂时也不必说，只是你的话我一定要行就是。你奋勉的志气很可敬。你现处环境很好，可以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听说你已离学校在工厂作工，西洋工厂里的情况，可由此明了；并且可以得到托尔斯太所谓“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以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启民在太安里周南女校。惇元在理问街通俗报。湘潭教育腐败已极，旅省诸人组织“湘潭教育促进会”从事促进，尚无大效。一师湘潭学友会亦将有所兴作，兄信尚未转去，稍迟当转去。兄沿途寄稿均登湖南日报，无转阅必要了。此信曾经复了一次，今再附识近来感想于此。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附：

罗学瓚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科学的根底很好。

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

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

润之兄鉴：

久未得你的信，不知你的母亲大人已完全好了没有？不知你的行止，现已决定了没有？昨由子暉寄来湘江评论第一期，弟阅后，各同学亦都看见，前闻罗君增益说很有价值，并销行甚多，不知现在还在办理，抑已停止？现国内发行此种周刊，日渐加多，如每周评论之外，尚有星期评论及四川学生周刊等。闻星期评论很有价值，未知兄等已看了没有？弟闻曾琦君说：日本近来于社会新学说，有许多分科研究社，并共出有杂志至四五十种之多，兄亦可以请周君名弟及傅君昌钰等介绍几种，或请人翻译，或自己研究，亦必多所取益。盖中国之新潮，完全自日本输入，尚不过得日本十分之一二耳。惟弟甚愿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时日学矣。昨有一同学向我说，中国百年之内无大学问家出。我问其故。他说：中国之人用功于文字太多，以研究科学之时光，多消磨于研究文学，故无学问家之根底。譬如柏格森为大哲学家，彼并非专于哲学已也，他又精于数学，有数学博士之资格。又长于物理文

学，及他诸科学，也都可与各科博士相比论。根底甚好，故能成其为大哲学家。中国学者谁有此种根底？又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以为求至国人之不如我，即已足（有此思想，恐怕还少），谁有志愿想伸足世界学者之林，而求有大影响于世界如杜威柏格森其人乎？求与人比并尚不得，况超出于他人者乎？我闻听了这些话很以他为然。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翼日回国，共同组织一个研究学问的团体，对于学问上为一个长期不断的进行。并一方面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又一面办教育，且学后作工，所谓工读并进。润之兄啊！我以有此种事情，总要做到才好。因为此是一种求学有益于社会及个人的最经济的方法。前子升说，符业的合社制度大概是如此的。

我近来颇有努力振作之气，一因出国后想将家庭、社会、国家之系累，一刀斩断，用专力于做人求学，不如此恐怕自己对自己不住。二因同学中映我以许多好模范，相形见绌，常思振励。故我在此她不啻有一些人我两旁时相告曰：又年纪大了，不可不努力啊！润之兄啊！这个念头要维持到底，要实行到底，才望稍有点成就。还很希望诸兄帮我的忙，或示我以好途捷径，或指引我的迷惑，这是感激的。

前子暉致子升信内，多有不满意于团体的话。这是子暉看错了，也是子暉费力费多了发出来的感想。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各人有各人的想见，不能说一两个人或一两宗事不满意，就说不要团体，这事也还望你积极的进行。现在周惇元，陈启民诸友还在长沙么？我以为惇元兄文学既深造，

若是出外求学，自必有大造于学问界，且惇元兄还无室家之累，何故不外出读书咧（我看现在有些人在中国闹得声名很大，其实没有好多学问，象惇元兄一样的很为难得）。我想他既不想造一个办事人，岂有不能造一个学问家的道理？启民兄的教员生活，不知已尝试过没有？我久想写信给他们，问一问消息，或报告一点事情，每次总以信多稍待自宽，实在对不住，语你帮我致意他们罢了。

又有一事，请你费心，就是我在此地已经两月多了，还没有写一封信报告湘潭学友会，也是疏忽的原故。请你将前次寄回的沿途闻见杂记，或关于述事的信件，交黄君纲钦或蒋君竹如转与会内诸君一看，他们说要做会内的报告，也听便。我前次写回的信，都是寄给你，因为即是请你转达两个会内的原故。近来好吗？

罗学瓚

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给 罗 学 瓚 的 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理论上的错误

拒婚同盟

荣熙兄：

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至。身体诚哉是一

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近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是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虽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身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者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详细我不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

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沒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沒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始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实践“废婚约”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象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沒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来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写出，此祝进步，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罗学瓚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身体的大问题

四种迷

工学励进会与通讯社

婚姻问题

润之兄：

我于七月到蒙达尔。至十一月才回“克作”工厂。我们这次会议，至七日之久，会员到的也有十三个之多，要算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一个盛会。关于会议的事，子升必有详细报告，我不必重说。那几日关于讨论人生的问题，最难解决，关于家庭问题，最为麻烦。似乎是两件重要的事了。但我私心觉得人生问题和家庭问题，固然要求解决；但还有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没有讨论，就是各人的身体问题。我们此次会议也有十三人，除女会员有两个较好的身体以外，其说要算我和芝圃的身体较好。但我的身体，确实是不好，譬如我自到法后就肚泄，间几日即发，到如今还没有好，又有痔病，间时漏血。芝圃亦说近来身体亦不舒畅。余如子升兄弟之软弱，蔡、李之宿疾、赞周、焜南、玉生、警予诸人均不甚强健，且多有肺癆或有呕血者，想这真是我们可虑的事。近见李和笙之身体颜面，比前日见瘦削，已劝其出工厂，留巴黎休养，此真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问题也。你前说国内各熟人，

死得可惜，要我们珍重，很是不错的。中国读书人，一味注意读书，每每以身殉学，这种毛病，可真叹息（也可以说是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

又我附与各处友人交接，常见得中国人求学的头脑，太不明了。第一宗错误，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的，就说法国人爱和平不振，作为不正当。又如见中国的小事小物或有一点比外国略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又譬如勤工俭学同志，自己想作的工不能找得，就说勤工俭学不行。这可叫做“感情迷”。第二宗错误，就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挪一部分推断全局。譬如见一个法国人醒醒，就一口说定法国人不爱清洁。会一个怠惰的法国人，就说法国人都懒惰。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是危险。我看连托尔斯泰之反对工业，无政府党之倡废金钱废商贾，都是这种观察之误。这可叫做“部分迷”。第三宗错误，就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譬如勤工俭学的人，当一时法华教育会找不到工，遂说勤工俭学做不到并不能发展。又如见工人罢工，一时混乱，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效力。这正是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就不能行共和之证一样。象这类的观察，可叫做“一时迷”。第四宗错误，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譬如在国内听了法国人好酒好淫，偶然见了有吃酒的有淫的，就信而不疑了。并且有些不必见有吃酒的有好淫的，也信口说法国人好酒好淫。又如主张礼教好的，见法国人活泼好自由，遂说法国人不如中国人的文明。又如从前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好，中国的道德比欧洲强，也不从各方面去比较是不是真的，于是开口就说西人无道德（其实西人的道德比中国人强多了）。象

这类的考察，可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这四种迷感，无论何人，总有舍不掉的。连我自己也免不掉的。这真是思想界混乱的原因。总而言之，中国人大多数还是没有科学的头脑。我从前不信哲学要从数学入手，到于今才懂得这句话是不错的，才知道论理学为一切科学之科学的道理。象这种头脑的人，我敢说一句，还不配于求学，就是还没有求学的资格。这是我一人近来交接朋友所感想的，你以为如何呢？

我们在法组织一工学励进会，先本定有章程，现在人数日多，章程不够用，拟到年底去修改，故现在不能作具体报告。大概来法的同学，有略有志气和见解的，或有能力和品行纯正的，都想联络入会，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国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组织以新民学会的人为多。

昨日在蒙达尔所议之事，有组织通信社一项，即由会内推一人主持信稿，各会员每月担任复信一封，或寄稿一篇。材料由各人自择，大概不外（一）工厂情形；（二）工人生活；（三）华工情况；（四）勤工俭学情状；（五）法国社会各种状况；（六）留法感想。以外还有译书报所载的，渐次谋扩张，待各人法语通了，那时取材容易，不患不能发展了，现在法信稿，由我征集，我拟一概寄至长沙，由你处置，或投长沙报，或投上海报，或附登会务报告，都可以，不过要寄一分或两分报来。又会员如欲零寄一分回家或朋友者（登他自己稿子的报），亦请照办（大概不多）。此事并不烦难，并且在此地各社员，因欲尽调查留心的责任，也可

得考察求学的利益。拟自八月起，每月分三期寄来，拟用留法工学励进通信社名义，并请你们派人选择，或校正，因我在此太无时日，不能做这种事的原故。

又你前回写给子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太无科学基础的人出洋，没有好多益处，求不到学术，常自觉抱愧，你可努力做去。

又说你的婚姻的事，也是很正当。我近见法国家庭之和乐，与组织之良善（比较中国的），常常骂中国家庭万恶。要改革社会，非先改革家庭不可，欲改革家庭，非先改革婚姻制不可。近又见留法各同学，常觉自己的家庭不好，大有悔婚出妻之意，我想勤工俭学诸人，将来必不免许多纠葛发生。我本是薄于情感不知顾忌的人，近来为家庭的原故，每日也要萦环我的脑中几次，恨不得抽刀斩乱丝，一声解决，可惜人道主义为崇，使我不能决心耳。前日在蒙达尔会议，一言及家庭，即有无限的悲感，家庭！家庭！真是杀尽中国人的牢狱！我等不能不设法赶急求解决者也，你现算无家庭之累，你婚事万分慎重。我将来也想到俄国去游一游，我们就相期在俄国会面好了。

我在“克鲁作”工厂，情形甚好，心志亦大快活，要算从前没有度过这种快乐日子了（工作亦略纯熟，法语亦颇有进步，工本也加到十五六弗郎一天了，除衣食用费外，每月可余二百弗郎）。近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严汇来之一万元），颇受湘同学诽谤，谓章汇来二万元，子升私吞了一半。

（其实只一万元，因在法久已宣传为二万元），种种诽谤，到处宣传，我虽闻之好笑，但勤工俭学同志头脑这样不明了，亦可为叹。

现在法国各报上喧〔宣〕传皖系与直系发生冲突，在北京一带交战，不知情形究竟如何也？湘省自张吴退去后，局势有无变更？以后用何方法整理，祈有暇时，详为说及，此请。近安。

罗学瓚

九年七月十四日

在省垣各同志，如周东园、陈启民、何叔衡、蒋竹如诸兄，请代为致意。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罗学瓚给毛泽东蔡林彬 肖子璋的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法兰西留学之乐
勤工俭学可图大发展
以具备三个条件为限

润之、和森、子璋诸兄鉴：

弟在蒙达尼公学，本只想居两月，不料华法教育会已和他立开学后三个月之约，故弟等尚须在此再居两月。弟等本为求学而来，有人出钱请我读书，这本无不可以的事。惟法国天气寒冷，不减于北京，且比北京尚早，差不多中秋后

不久，即时落雪，即已发有火炉。我等既无外套，又身上无别项衣服可穿，虽口口声声说借此可以练习身体，然有时亦未免乎寒耳（法国学生穿衣服，比我等还少）。且弟等因靴子烂了，现多著中国鞋子，亦有趣味之事也。惟不能到外边游走，未免牺牲卫生之事矣。但弟等处境虽如此（亦不过少数人），却在此甚有乐趣，请为诸兄述之。弟前说一些神经过敏的话，什么同伴多不好哪，什么习惯不良哪！……到于今观察此地的同学，多规规矩矩勤勤恳恳的读书，常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如人。虽自己抱愧，然由大体上观之，甚为可乐。此一乐也。又后辈来的同学，很有几位有品行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如曾君琦（四川人曾为救国日报主笔，此人品行学识都好），李君锡祥（广东人，精于医理卫生之学，品学都好）等，又有与共学之人，在此互相劝勉，时有受益，有疑问亦可询问。此二乐也。又成立有留法学生会，内分杂志部、演讲部、踢球部、雄辩部，现出有学生会务报告，（敦请旅法名人，或同学中有学识者，演讲科学时事及各人心得及各省中外情况在杂志上发布）。若雄辩部，则出题互相争辩，题如“知识与道德孰重”，“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资本家与劳动家”种种重要问题，互相讨论，很多受益。杂志亦定有好几种，轮流阅看。足球部则可邀法国学生为一组，或同学分为两组，都可。又有同学加入法国公共球团者。凡此皆为可喜之现象。此三乐也。又有同学中有来不久即订阅法报者，或用法文研究科学者亦多兴高采烈，此四乐也。虽有困难，亦多在所不计。

至于他们已入工厂者现象不十分好，因太无预备，太来早，既无技能，又不通法语，又不能了解勤工俭学之宗旨，故教无可教，学无所学，惟日呼生计困难，甚有被厂主斥退

者。此其事吾人已早在意中，前弟与子升商量，已详请李石曾先生谋以后补救之法（大体尚好，并非全体之现象）。盖非勤工俭学不可能，实所需之条件未备也（即技能、法语、工旨）。换言之，即无勤工俭学之本领也。吾人计议，若具备条件，将来很可图大发展。因法国既需工人甚多，法国工党又已宣布不排斥外国工人，且法国各工厂多有学生在工厂内实习；或工人多曾毕业于工校者；或法国工厂附设有学校者就其所习指明其理，是无异于居工业学校也。以后之人，华法教育会，定必有相当之限制，湖南之学生继起者固不嫌其多来，唯总要预备，不可学前几次来的过于冒昧，自取怨悔也（近日很多怨悔者湖南人居多，求急效之故）。

前函子升说将回国，此议已取消，因李先生现在正思在巴黎组织大学（学用费决已二百元为限，不超出北京大学），将请吴稚晖、蔡元培诸先生来此经理，又必定会要回国筹划款项，故此行非自己出马不可，必不致要别人代理，故子升回国之想，不能成事实也（弟亦甚想其回国，即诸兄亦必望之）。和森诸兄不知何时可来法！诸兄近日都好吗？

罗学瓚

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给罗墩阶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湖南问题
主义的结合
学生自决

章龙兄：

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沒有一句复答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沒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它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亟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它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励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入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

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如何？

“会务报告”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约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为会友相互辩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与会友间往返信稿，不论新旧，请检出寄弟。

“湘江”尚未出版，固因事忙，又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很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诸语，使我不寒而慄。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现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预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

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罗璈阶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湖南问题

对于学会的希望

及时求学

润之兄：

你六月三十日的信，展转交付，今日才到我手里，我读过之后，非常喜慰。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希望你今后的生活，更趋高尚，日进无止。

自从你赴沪后，我因不知你住处，又是彼此忙着，所以很少通信。但我们意气相期，理性上的交谊不浅，这些小处何必介意！我所以觉得你的话，还嫌琐碎，润之！几经锻炼的老伴侣（战友），现在还这般客气，岂不是太斯文了么？

你的意思，注意一省的事业，想将湖南办好，我也很赞成。零碎解决，本来是很切实的入手处，于此我只祝你成功，并不再用再申私见。

学会会务发达，我觉得很高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

界沒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沒有輿论，沒有事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沒有成绩了。至今现在一班所谓学会性质，无非预谋干祿，把持一界饭碗，滔滔皆是，尤其盼望大家力避其染，自家估量一个最高的价格。“会务报告”内容如何？我当然可以贡献点意见，但是请你将要目告我，不然，我胸无题目，殊觉茫然。湘江出版请寄下一阅。所说湖南青年界研究兴味不大浓厚，你还是先觉的人，责任自然很重，再出版的要求，更不可少了。

你下学期担任课吗？最好多挪出些自修时间。耀灵急节，岁月易逝，无法挽回。况思想学术，节节僵化，更不可不注意。你的英文近想大有进取，关于肄业的近况及预计程序，也可以告我一些么？至于我自己，本想在此二年，（已过），便图出国。不过现在的形势又不同了，出国的事还需延展。我校虽不是十分好的读书处所，北京却是一个顶好读书的地方，我不是身体的无用，想也有些境界了。自去年来，我读书又颇有点头绪，厌世观念，自谓绝少，不过有些旧识近来都远去了，生活不免有些不快，但这也是偶然的感觉，不算甚么。我们达教胡同的团体（曦园）因人数中减，已告解散，现在我搬在马神庙西斋（第一寄宿舍）居住，以后将继续住下，以后的生活，自期更当秩序些、安定些，有什么话时，再向你说。我省教育界情形，想有大改造，大建设。但是关于学款，可有了把握沒有？关于人材，新到了些好名角沒有？你们最好将教育状况，通信京报，俾我们大家明了。

章龙上

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李思安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钦文姊：

你这封信我八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厚谅我吧。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近况。

弟泽东

十一月二十五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附：

李思安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润之先生：

十二号平安抵沪，预备二十二号动身，没有英法船，只好乘日本船。且价较廉，因我在长沙和你商量借款的地方，都失望了。所以肖君想搭三等舱，不过四十元。但是我用费实无从减省，昨日又向谭常恺君商量，在合作银行借了三十元，今日去取。肖君若要时，还是分一点把它，不然我也不敢动用过多，恐欠多了帐，难于偿还。

近阅报载南洋来函，说英政府取缔华侨学校，唉！这个信一来，于我们的行，不免有点馁气咧。不过还是决意前进，无丝毫退缩意，请放心，以后望你常常指教，使我在黑暗中得线光明。

《湘江评论》出版吗？前日和毛飞君谈话许久，望你在这时候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力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下略）

思安上

九年八月十九日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肖旭东蔡林彬 并在法诸会友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赞成马克斯式的革命。

学会的态度：（一）潜在，（二）不依赖旧势力。

会员的态度：（一）互助互勉，（二）诚恳，（三）光明，（四）向上。

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学会的四种运动。联络同志之重要。

和森兄子升兄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书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

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沒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沒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理：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各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甚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

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甚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在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虽然有两个对抗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斯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

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影，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在（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止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

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工具，正如朱子所谓“学校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翻，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此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

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若干倍。假定无产阶级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事事是当前的，是不能消减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亡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种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会曾经讨论过，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一是“不依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

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为纯粹预备时期。子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挹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 湖南运动；2. 南洋运动；3. 留法运动？4. 留

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

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附：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研究社会主义

希望实现小学计划，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合居等。

我们须于文化运动更进一步
润之兄：

我到法约近五月，时常想写信与你，又时常按住。我和母亲及警予咸熙等以二月二日安抵巴黎，母亲心力颇强，故船中困疲皆已矜持过去。我初到时，因旧病复发，甚为痿弱，旅偕母亲及警予咸熙等来蒙达尼地方，分入男女中学校，补习法文。母亲咸熙等同起居，同上课。我则决定恢复体操游息，略如麓山故事。每日生活，全在公园空旷中，不上课，不看书，惟饱吃面包。而如此一月余，体气大健。日看法文报一节，因校中功课浅，及求知欲切，决不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情形如此，故一切无所活动。所以常想写信与你，又常常按住。

我现在还是聋哑兼全（因不注意语言，又没有直接和法人接近，）不过不尽为瞎眼耳。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颇思综合写来，以作我与你通信资料（因此仿佛无甚可告）这也是我写信与你迟迟复迟迟的原因。近在汇译德国政变与其社会，共产，工团，各类消

息寄你，起自社会民主党之分裂，以迄此届选举终结，故须等至六月中旬始能告竣（德国此次选举期为六月六日）。而你四月一号与四号的信，均由子升转来了，因此赶紧先行写了此信。

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一年中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一年后兼习说话听讲。现一切住校费用，皆由华法会借出，（勤工学生皆同）或者还可续借数月，至没有借的时候，才去做工。警予等皆同。如有他法可想，或权其轻重，把工按住，若能，则当然经济得多。以现在俭学费用之廉，实足以加增俭学之动机。警予已决计俭学数年，将语言习好，情形习熟，设法大辟女子外出之路。勤工俭学生近千人，好分子占最少数，暂不多加组织〔现只有工学励进会（为李和笙罗学瓚等所组）潜在进行，〕新民分会亦暂按住，俟机会成熟，将来自有办法。

兄留湘两年，极为重要。我意章甫于兄在湘之时，亦不必外出，可在长沙极力教小学。两年之中，会友能办到百人教书，最好没有。启民，惇元，宜久在湘，主持教育，不动。兄如不办报，于自修外，宜紧张教书，少年互助团大好，两年中能鼓舞其增至千人以上，更好。诸兄在湘，宜于此团体大加提挈，启发。叔衡似永不可离湘。去俄不如留湘之重要。如何（就他一人及会务言），犹望能将小学计划实现。此事比之出报更重要。学会办文化运动本为应有之事，

我们既不为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则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比之出报，出杂志，更重要。现少年中国学会（此会在四川本地无根据）专以办文化运动为事，我以为好，但是我们的须更进一步。湘事定后兄首先聚精会神，将小学实现为要。有暇则从事湘江评论亦好。不过两年中总不宜因出版而碍会务进行（指被封而妨学会等）。

我以为我们于文化运动，大可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此时我以为新民学会宜办三种邮花，以扩其用：一种贴于男女各师范学校，其法在办好会中学术演讲会及以个人与师范生之优秀者往返。一种：贴于各县各乡的小学校，其法以上之联络师范生为根据，俟他们返乡办学校，即可实行。或择现任各处之小学教员通信及介绍书报启发之。一种：贴于现行之各出版物上。此三种邮花，皆可济会中经营之穷。

（因会没有钱）而其作用与自办差等。兄以为如何？

现在中学以上的文化运动，要算各处都已迸发了，新民学会所宜注意的，自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但是如何办呢？一，我以为你的小学计划成，同时应筹划劳动教育。二，应鼓吹各种合作运动（消费组合贷借组合要紧）。三，应出一些小册子（仿新生活）。四，好小学能设法多收农家子弟更好。五，聚会友中之兄弟讨论，如鼎丞之兄，你之老弟，我之兄警予之兄（经商能手，现在乡经商，且极可与谈），叔衡，瑾玕，亲属，教新会友之亲属，都可以约聚，启发一下。我对于会中意见，大略如此。

咸熙答应入会。溆浦女校教员任培道女士，今年夏秋间来法，警予甚称其为人（问陶女士知道），我们想介绍入会，此人道经长沙，请邀聚讨论女子事宜。又溆浦女校长吴家英女士，（溆浦女校教员大概皆好，问陶便知）亦很好，

如来省，可与谈。淑浦女校为警予及伊等极力经营之学校，我意学会当郑重贴几分邮花于其上，请酌之。此校太僻处，当设法传递新出版物。直淑浦女士，（问陶便知）在省垣女师范者很有几人，此皆百经训练，有如子升之学生，其中有警予侄女，极好，极好，请邀同陶斯咏极力加以提携，将来必有可观。

我写至此处，发了狂热，希望陶女士和启民久顿周南，惇元久顿修业，叔衡久顿楚怡，兄与章甫于两年中将小学校办好，然后赴俄，则根深蒂固矣。

新民学会尽其可能扩大，同时尽其可能严格，这是我的总意思。

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现未印出）。家母甚好，惟间有旧病复发，惟不如在国内之甚，他诚挚的希望你，致意你。警予忙课，未另外写信，也致意你。国内新出版物，请设法多寄（过日议）。现在我们定了的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建设，新潮，新青年等，中华馆新出版之世界两种图，有钱请买，时事旬刊还出否？

刘清扬女士弟曾介绍入会，此人现往南洋，不知兄有机会见之否？此人很可以，弟又曾与兄言王启润女士，在京见之否？新会友之性格，请随时介绍一二。邹蕴真兄如何？宜使其来长沙，或在乡办学校。杨师遗眷，弟主张来法，兄以为如何？忙问
安好。

弟彬·一九二〇，五，二十八号。

与弟信，皆由子升转。

此信请转启民，惇元，叔衡，殷柏，诸会友未另，乞恕。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附：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社会主义讨论

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润之兄：

湘局定，想已归。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报告。我到法后，卤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分四种形势：

1. 无产阶级革命的地方——俄。
2. 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
3. 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
4. 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

1. 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2. 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

3. 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

4. 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 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

1. 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

2. 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

3. 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

4. 万国同盟绝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虐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 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

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

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形势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现在红军已打倒波兰而压入波斯，这种情形你必熟悉，而中国摇身一变的政客和武人（如陈炯明）正在准备做列宁，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人的必为一干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甚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

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织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內）。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此意已与曾慕韩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须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加入新国际党，就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內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徐彦之等赴日，不知如何联络，现在中国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支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

倒时，我们量力之所能采两个方法对他：

（一）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

（二）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以我观察，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其因有二：

（一）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十万二十万之身家多，故反动者数目必多。

（二）中国自来政治影响于个人经济者很少，个人经济极自由，一旦集产，反动必大。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必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

俄十月革命共产党万人，现尚只六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俄工党只百五十万人，现四百万。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我拟在此组织一整队赴俄做工。法语于俄甚行，勤工可得川资。将来以俄为大本营，纵少要有青年工人万人在俄。国内往俄难，请先鼓人来法。

你前要我做通信，现因有系统一点的编译计划，无暇作此。

改造地图，请买一部寄我。

你如对于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

注意而不可游移：

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叔衡，启民，惇元，殷柏，诸友均此。

彬·一九二〇，八，一三。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附：

肖旭东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

子升这信，报告赴法会友在蒙达尔尼开会情形，并发表对于同志进行及会务发展的意见，颇关重要，是会友人人应该注意的。编者。

润之兄：

多久想写信与你，因想写一极详之信，而又屡不得充分之时间，至今始行动笔，还不能十分详细，以后还是短写密写为好。

这信所要写的，大概分下列几条：

（一）复你来信。

（二）报告在法会友情形——即在法会务大概。

（三）述我个人对会务意见。

（四）略述个人近况及将来求学计划。

现在分为四段写来。

(一) 复你来信。

你四月一夜及四月四日北京来信均到，又平民社稿，及湖南建设宣言等印刷物均到，非常之好，非常之可喜。

不结婚，主张恋爱自由，最为正当。但我对于恋爱也有点意见，以后有机会再说。

“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这两句话，极得我心，我对于你也早有意不扯你来法了。你读书的新研究方法，暇时请告我。“结伴游俄”最赞成。顿湘两年，必要。看势说话，或多顿住一下，亦无不可。我们的事，不在目前，据我看，也不在十年之内。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但对于俄文要赶早预备才好，因小孩子工夫，越做得迟，就越费力。湖南事必在一两个月间可定，你归湘想亦在两月以外。归湘后大约有几事是要你做的：

(一) 你自己读书(与好友同行)。(二) 整理会务。(确定规模，立稳基础)。(三) 仍一面教学生——不必限定小学生。(四) 仍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立于舆论的地位为宜。

“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此语极当。我甚希望叔翁迟点出外游历，暂顿湘教学，联络教育界中之同志，并执行会务。因为我们三五十年内都是要外出奔走求学储能，无人来经理此事，只望叔翁尽分工之责，收互助之益。如能即时外出，最好随兄游俄，不必来法，法国方面，同志已多，再来一些，也不过添增臃肿，太不经济。我意陈章甫兄也不要打留法主意了，同你游俄去也好。

“各方面——即如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这话说得非常痛快，非常动

人。但我想这是“他们”活动的背影的流弊。据我看，我们这几个老朋友，的确深沉些，恳挚些。免缺少“活力”，有点腐儒气，陋儒气。我常与此间同志说，我们要救我们性质的弱点，要注意“动”，只是要“动而不浮”。“动而不浮”四字的精神，五六年来，兄即有之。我自到法后，亦颇用力，所以我现在也豁达些了，大力些了，不如前此之小气之狭隘。

向女士真好，已与深谈数次。薛君现颇有韬光养晦意，及谈而不深。“学会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极好。法国方面，已有最真挚亲切的联络，见后会务段。

（二）法国会友概况。

先述第一次会议如下：

（1）发起 升、熙，到法既久，十二月和笙芝圃到，四人即日有谈论。今年一月蔡向诸友到，是时会谈亦易。迄六月十五日曄，焜，赞，玉诸君大批全到，升，熙，笙，森，芝等又各分处，急想见面畅谈，遂约定大会一次。

（2）地址 在“蒙达尼”，因此地蔡氏三人，向警予，熊氏姐妹，赞周（新到，分配在此，）有七人在此，以不动为便。故开会之日，和笙自法国西北工厂到升寓（巴黎），芝圃自极北工厂到升寓，升，笙，芝，三人同去芳丹白露学校邀焜，曄，玉，于是六人同车到蒙，荣熙独自法国南境工厂到蒙。

（3）会期 到蒙略有先后，从全数到蒙起为七月五日，至七月十日散会。

（4）谈话 第一日 七月六日 个人感想。（最近新知）

第二日 七月七日 会务进行。

第三日 七月八日 会务进行（上午）。求学方法（下

午)。

第四日 七月九日 求学方法(上午)。个性批评(下午)。

第五日 七月十日 个性批评并对于未到会之会员之个性介绍。是日合案午餐，连会外朋友共二十余人，饭后游公园照相。

个人感想

各人所述甚为繁杂，记其大者如次：

1. 焜甫君提出“说宇宙观与人生观”。

焜甫君自述人生观必产生于宇宙观，孔墨老佛之人生观不同，乃以其宇宙观不同之故，阐发甚多。升谓：既曰人生观，便不是人死观，人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近来并觉得“人生便是一件美术品”非常有味。我们都不是情愿去死的，即令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宇宙观，然不可一日不生活，不负责任。和森谓人生观不必产生于宇宙观，即现在可置宇宙问题于不顾，先行解决人生问题。赞周谓吾人之人生观，必发生于宇宙观之先。以外各人多所辩论无极大的结果。升在此时述一段意见如下：

我们有一弱点，即不喜充分的说话，即无共学的精神，以后总须做到“矜平躁释尽情尽性的讨论”希望国内同志，于此亦能注意。

会务进行。

(一) 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故于中国与世界之改造方法，极力讨论。先说主张：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子升谓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

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赞周谓现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较难。外和笙，子暉，诸人亦多讨论。

（二）会务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如有同志活动之必要时，可新组一会，以新民会员全数加入亦可。不可以学会为牺牲，一时东扯西拉，凑集一些目的不相同之人。

（三）会章修改，本为必要，但此系具文，可从缓计议。

（四）出印刷物，尽力所及，切实作出报告亦可。若月出一册，现在力量——人材，经济——或者不够。

（五）在法同志，亟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尽可立即直阅法文书报，一面练习文字，一面获取新知。

和森到法，即卤莽看报，现有进步。升于巴黎各党派书局，已知大概，搜得各党派书报小册等可数百种。暂时同志可分作三部分同居，（一）蒙达尼，二蔡，一向，二熊，共五人。（二）哥伦布（升寓所在地）赞，焜，暉，玉，即日搬来。和笙欲出厂养病，亦即日搬来，房屋概由升先生佃定

（三）芝，熙，暂时仍各居工厂作工。（一、二、三）拟合住一处，长久作工。

至合居后，分工所阅之书报略于下：

和森，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以及其他有关系之小册。

赞周，和笙，分担合社（协社）主义，和笙看合社原理论之久，如不病，即可直译。现又新定合社大会所出版之

“合社事业进行”一种周刊，赞周于此事，甚有趣味，即看此报。以外从“合社书局”搜得关于合社之小册之百种，大足参考之用。

子暉，看日报，担任新闻，及他种小册。

玉山，看第二第三万国社会党出版物，并留心其事。

焜甫，看社会伦理，社会哲学。

向熊二女士，看妇女声，女权报，及他项小册。

（说明）以上诸人除和森外，余均以三分之二之时间直看书报，仍以三分之一研究法文，为基础的研究。子暉练习语言较易。诸女同志法文进步极快。和笙法文根底较深。合居后每日定时学术谈话一次。

（外贺果颜昌颐等同志，亦有共学性质，分任看书，将来自可合并。）

求学方法

大体方法，略见上段。其他细则，他日有暇再述。

个性批评与介绍

（和森）坚强防僻。（焜甫）须去寒士气。（赞周）分析力强，须防无条理。（子暉）活泼有孩气。（芝圃）严正防简单。（和笙）精细。（荣熙）宽厚而官能欠灵动。（子升）周到有条理，防狭隘。（警予）温良防躁急。（季光）从容不迫。（叔彬）自信力强，欠灵动。（咸熙）颇强固。（玉山）温和但有女性。

总结，我们个性都有极弱处，也都有极强处，充分发展各人的极强处，就是补救弱处的一方法。

以外如润之，叔衡，书衣，敦元，章甫，殷柏，李思安，瑾玕，诸君个性，亦由相知者提出向新会员介绍。

此最要，最有味，但以上所述不能完全。（接第102页）

根本计划	1. 从事实上确定会务进行方针。	{ 通洋文者千人，至少五百。任学校教师者。 { 至少千人，小学尤要。作工厂之工，与作农 { 工者，至少千人，注意分布。商界若干人。 { 此事较难，至少欲筹储十万元为印刷费，编 { 译费，及文字鼓吹时之邮费。 { 又小学校一所——即会址——基金。	{ 4. 综掣会务大纲——在湘稳立基础。 { 5. 筹办小学，开办时可由在湘同志义务担任。 { 6. 代为推广少年互助学会及某会等，此系预备会员。 { 7. 联络教育界，会友仍继续教书。 { 8. 试办合家（理由与办法候告）， { 9. 物色基本会员，老人物亦甚要紧。	{ 10 帮助现在沪预备留法女子之进行。 { 11 注意西南大学。 { 12 此处学界或新闻界必有同志。	{ 13 日本部——请傅，周，注意同志。 { 14 德国部——促章龙设法留德，先行力攻德文，并留心 { 德事，看德报，至少一分。 { 15 英美国部——促启民君前往留学，何如？ { 16 法国部——细目甚多，注意里昂大学。推广工学世界社。 { 17 俄国部——毛、何，预备前去，章甫能去亦好。 { 18 南洋部——宜去重要之人。				
	2. 准备人才					3. 准备经济	长沙方面	上海方面	海 外 部
	学会我见								

所评，亦未必尽当。

会谈时亦有非会友而到会共谈者。

此次本为熟友聚会，非正式会友开会，故尚有会友未邀入。

随此信付回小照片多张（蒙城会谈后所摄），请照样张填好姓名，分赠在湘会友。又一大张，请存会中。

（三）我个人对于会务之意见

（先作一简表再说明之）（简表见第101页）

1. 以前学会状态，不过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虽有远大计划，然不甚明了，以后须定具体的计划。所谓具体的计划者，概别之有二：（一）力学。（二）力行。力行之事，最宜注意者两义：（一）改造世界与改造中国是一件事，宜同时并进。（二）因此改造中国，不可忘却世界，要戴改造世界的眼镜去改造中国。力学之必要：（一）我们常识尚不充足。（二）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三）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

2. 我们学会现在的优点：（一）切实，亲挚，无浮夸气。（二）多小学教师，与教育界有很深的渊源。（三）多女同志，且极优良，（此为他会所不及。）

以上三者宜极力发展。（女同志之优良者尤为可靠，极宜注意。）

3. 我们学会现在的弱点：（一）幼稚，会之组织与会员之力量均如此。（二）会员性质诚挚谨严之分最较多，发展活跃（不是浮动）之分量较少。

以上二者，宜极力猛省，觉悟，进步。

培养少数条件极适者为大学问家，亦极重要，其故：

（一）中国现在无一可数的学问家；（二）我们年龄太大，

境遇太苦，虽不自馁，然毕竟难有多量贡献于学术界；（三）一个忠实有用的大学者，其有利于社会远非多数寡学者之堆积量所及。至于适当之条件：（一）年龄，（二）志远，（三）资颖，（四）家富。

（四）述我个人求学计划

详述请待他日，略言之如下：

我到法后境遇最苦，最不快活。说到读书，正式上课读法文，没有达到二十小时，现在稍为懂得几句法语，看得几句书报，都是东抢西扒得来的。

我从前有为大学问家的意思，近来过细计算，（一）年龄太大；（二）境遇太苦；（三）根底太浅。有此三因，恐是梦想。然此是自觉，不是自馁。但我虽不做大学问家，却愿做个大常识家。等到成了大常识家，或还有做学问家的机会，不能呆定。并且我近来颇有具体做事的热愿，我最主张与世界各地同志联络进行，互助互益，——如今之万国某某党——我便喜欢去做此事。。依我现在的情形，若再专读两年法文，一年英文，（法文可通法，意，比，瑞，西，诸国，英文可通英，美，日，德诸国。）三年之间，并研究社会学，三年之后，即可实行（但无此机会）。至于我所喜欢的学问，如物种学，人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娱乐学等都极愿意，仍以教育事业为中枢。现在既无三年机会，便延长时间至于六年十年再说，这是无可如何的。但我不是为我要求学的，一时做不到，我也不十分着急，不至于想起就要自杀，归根一句话，只好说是“以久制胜”。（这是达化斋的法门）。

话说完了，问你人健。

弟旭东书于巴黎西郊。

此信自七月中旬写起，至八月初才完。

叔衡，瑾玕，启民，敬东园，章甫，殷柏，及在湘诸好友均此。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给 蔡 和 森 的 信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附：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共产党之重要讨论

润之兄：

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今子升归国，再陈其略。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惟理派（I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惟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我对于人性只认为有“可能性”，比如到了饥的境地，性之可能为吃；遇到困难的境地，性之可能为思（想方法）；处现经济制度之下，性之可能为“人剥削人”；处怒或挑剔（如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之时，性之可能为“打”或“杀”。究其极，这种可能性，与别的动物一样，没有别的高贵不同。总之人由低等动物进化成的。道德根于先天之说不能成立，成立也无意思。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为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惟理观。惟理观弊病到了化

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的一桩大喜事！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惟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惟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孙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他们叹观止的地方！今日俄德革命之不同，根本即在此点，我今拟二公式：

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言时），取消国家。

德多数社会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

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

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

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

张君迈〔勸〕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见解放与改造）。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不马不牛，这种冬烘头脑，很足误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

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比如生长于现政治下的工团主义（经济的职业的，而非政治的）充其量不过是运动到产业国有，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的“国”里去，这不但于工人无益，而且反巩固“资本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比如三角同盟国有运动，自去年到现在，没生一点效，现在矿工为增加工钱、减少煤价争议数月（矿工已发停工预告定期本月二十五），政府公司丝毫不动，所以我们专门经济的职业的工团运动，经久不能超出“工钱、物价问题”，如何能得到解放呢？至于现在俄的工团就不然了，“工钱”“物价”都由工团自定，生产管理与分配，工团与全国经济最高苏维埃共同执行。这才真算是解放。然而所以能达到这步，因为他获得了政权。现世经济政治早已打成一片。怎么会容许你单做经济解放呢？所以现在有两种说法最足延长现政治之危险而暗杀工人阶级：

（一）反唯物史观。以为以此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而不高尚！

（二）分离经济与政治，教工人专去做经济运动，做保护职业的运动，使他们永世生息于资本家剥削政治之下！

这两种危险的说法，凡冬烘先生（欧美如此）及资本家御用的改良派社会学者总是瞎眼说去，不怕害死工人！

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大战爆发，于是各国不真实的社会党及工党，尽向军国主义投降（即向资本家投降），尽变为

叛逆，爱国的社会党和工党，有两个叛逆的总机关：一为第二国际党，一为万国工会。

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既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于一九一八年改名共产党。与德李伯克奈希，罗森堡，所手创的斯巴达加斯团（不久亦改名共产党），及匈贝拉所组的共产党，组织“第三国际党”（即万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正资本家分赃会议在巴黎热闹时），在莫斯科成立，加入的团体共三十五个。高丽亦以劳动联合会的名义加入，波斯，印度，土耳其等，以东亚民族解放大联盟的名义加入，独中日没有团体！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与没气焰的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俄十月革命成功，各国犯了罪的革命党及工党又疑又怕，去年二月已死的第二国际党，在伯伦死灰后燃，开了一次大会，赞扬俄革命的占多数，诋毁的尽为犯罪已深（入了战时内阁）及执迷不悟的改良派，不久大多数纷纷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其中的大党如德独立社会党，法统一社会党，英独立劳动党，西班牙社会党，瑞士社会左党等等，并宣布与第三国际党商议加入条件。故今年七月万国共产党开第二次大会。中西南欧及美社会党都预会，中国亦有两个代表，但无团体名义。现中西欧各代表已返国，正在开全国大会讨论即刻加入。中西欧各社会党战时屈服于军国主义之下，多少违犯了主义，此缘于平日改良派及修正派之恶劣影响，现在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既在俄罗斯实现有效，于是各国觉悟的工人莫不醉心于红色化。而各国社会党和工党大呈分裂之状。从中把持的无非是几个改良派，修正派，中立派的旧首领，这种首领在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中，不久即

会遭淘汰。现在英，法，美共产党（英八月成立的）业已成立，加入万国共产党，所以英，法，美的社会党非加入则不能立足（因违反工人的要求故），我今把美，中，西南欧巴尔干，及东亚的已加入或即将加入万国共产党的略举如下：

美，已成立三个共产党，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已参与木斯哥大会）势力不大，首领为豆伯斯，因反对战争，现还关在牢里。美 I W W 势力亦弱，但主张阶级战争，为美劳工的真正组织；已参预木斯哥大会。美势力最大的劳动联合会的领袖为刚伯斯，极旧极反动（木斯哥指名排斥）。社会党 I W W 和都参与木斯哥大会，与第二国际党及黄色的万国工会脱离关系。

英，不列颠社会党与别的三个团体，自去夏商议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今年八月一日成立，加入木斯哥万国共产党。英共产党始拟不令劳动党加入（党员已近五百万），列宁力主可容其加入。独立劳动党已宣告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国际改造，现英劳动党阶级战争的色彩益明。援俄及国际运动甚力（近又派代表参预俄波和议）。三角同盟将与俄工团于今秋冬发起红色的万国工会，打破死灰复燃之老的黄色的万国工会（他有七千万会员），反动的工党旧首领将被排斥。

法，统一社会党之极左翼，已组成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之一部。统一社会党今年二月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第三国际党协商加入，此次派二代表参与木斯哥万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木斯哥加入的条件极严，大略如下：

1. 改名为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运动皆为共产党性质。

2. 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人阁派的首领，然后才准加入。

二代表已返国，即将开全国大会，讨论加入条件。法工党首领为霞华，木斯哥指名排斥；要法工人将此人驱逐。

德，独立社会党去年十一月大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加入，昨派四代表参与木斯哥第二次大会。加入条件与对法略同，要他排除右翼首领才准加入。独党十月将开会讨论此事。斯巴达加斯团改名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主要分子之一。德工党旧首领为莱琴，木斯哥指名排斥。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已于前二月脱离第二国际党，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

比利时，社会党为爱国入阁出卖主义的首领所把持。共产党已成立。

意大利，社会党左翼已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劳动联合总会亦加入。社会党右翼的改良派将于下次大会被除名。意近日劳动运动占领工场，管理生产，绝非国有运动可比。

匈奥，其社会民主党与德多数党一样的与中产阶级联盟揽政权，在社会主义上已宣布死刑，匈共产党为发起万国共产党之一，奥共产党也是其中一员。

雅各斯拉夫，共产党运动极得势，此次城邑选举大获胜利，中产党皆失败，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团体有八，现组织政府，此次不应法命助波攻俄，社会党政府与有力。

保加利亚，战后破产，共产运动极盛，上次国会选举获选五十名之多。与中产阶级联盟的社会党一败涂地。现俄共产党的党纲，在保销行八十万卷。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

罗马尼亚，战后军国主义大盛。共产党运动亦盛，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此次多瑙河流域三小协约国，不听话命助波攻俄，即三国共产党之力。

东亚，印度共产党已成立，去年加入木斯哥，我在法报见其宣言。

土耳其，共产党于今年八月成立。昨波斯，印度，埃及，土耳其代表于参与木斯哥二次大会之后，又在巴库开东亚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大会。印度又于八月成立八百万工人的联合会。法统一社会党及人道报派代表赴印度祝贺。高丽去年三月以高丽劳动联合会名义加入木斯哥，此次又有二代表与第二次大会，中日亦有代表，但不见团体名义。

以上所举系荦荦大者，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布尔塞维克与门色维克（先同属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开首是争党员加入的条件，布派主张极严格。门派主张宽大。其后布党主张极端的行以下的公式，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Soviets，而门派还主张与中产阶级联盟，所以十月革命不得不起。现在布党改名为共产党，加入条件仍极严格，所以十月革命时的党员仅万人（极确实的分子），现在不过六十万。现在入党条件如下：（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

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现全俄政府每部的事纵多不过十余人担任，全国劳动联合总会五人担任）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中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此部专为党员做星期下午的义务劳动，以为社会倡率而设）。在十月革命前，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所以议院行动在各国社会党弊端百出，以致工人不信用政治行动，而在布党适得其反，他第一从根本上否定中产阶级的议院主义。第二以为应入到里面去打破他。一面党的群众在外面酿革命风潮，一面党的议员在议坛上酿风潮，队员亦须参预群众行动，利用选举战争为宣传运动，而不在得票多少。第三党的议员一言一语，皆须以中央委员会所授命的态度（革命的），一面在议院内做合法的工作，一面又在议院外做非法的工作，一等运动成熟，即打倒议院和政府，而做完全的革命行动。十月革命时，俄工团分子约百五十万，大多数反对布党的主张。不及数月布党在各工团中都组有党的团体；将反动的首领驱逐，一变而为多数赞成布党的主张。即如十月二十五日，乃是一种定期的革命，是日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列宁所提出的议案为将临时政府的政权移与全俄苏维埃。门党及中产阶级各党和克伦斯基都到会投票，结果工人与兵尽赞成将全政权移与苏维埃。于是克伦斯基只得跑了，这完全是一种组织的革命，绝不是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有一干人生怕革命，其实是错了，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

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那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或者还可以免掉，所以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集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究宣传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土地，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

沒有纸了，我的意见一时不能写完，再笼统说几句：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沒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故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与工团的见到了的分子，业已改了倾向，我不信这种倾向会错的。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

阶级专政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办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儿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战胜的中产阶级又不知道要得到好多的赔款和殖民地，而战胜的国际的托辣斯的组织（指国际联盟）将越发巩固，工人真是动也动不得了！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准备么？

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

彬。九月十六。

（选自《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附：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一九二一年一月）

民国十月夏刊

这一本会务报告乃专纪十年一月长沙会友三次会议情形。这三次会议，头一次是新年大会，在一月一二三号。第二次是本年一月常会，在一月十六号。第三次是本年二月常会，在二月二十号。这三次讨论，极为详尽，分记如次：

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因湖南政局影响，好久没有开会。九

年年尽，长沙政局略定，会友在此者亦达二十余人，遂谋聚会一次。此时评议员任期（一年）已满，不能开会，遂由职员何叔衡、周惇元、毛润之、熊瑾玎、陶斯咏等，先期商定开会手续，发出一张通告：

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十年一月一号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下列各种问题：

1.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2.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3.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4.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5.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6.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7. 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8. 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9.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10. 会友室家问题；
11. 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12. 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13. 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14. 临时提议。

上列各项问题，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解决，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于开会时发表意见，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开会地点：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会时间：第一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第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各带餐费二角）；第三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务希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并请严守时刻。

新民学会启

十年一月一日，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十余人，是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十时开会。何君叔衡主席，主席请毛润之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毛君说：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致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集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各种问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遂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毛君报告毕，主席将要讨论的各问题提出。陈启民以开始三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下到明日讨论，圈出其余问题之几个，在今日讨论。毛君润之谓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讨论，但不表决。众赞成。于是开始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三问题有联带关系，故连带讨论。毛润之云：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见巴黎来信。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谓第一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荫柏云：改造世界太宽

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谓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们不能为他们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们也应负责。至于“改造”

“改良”，我主张前者。因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目的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

“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讨论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问题（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讨论。

主席请众讨论下面的问题：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毛润之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讨论的结果，主张学会取潜在进行态度。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巴黎来信言我们学会好处在稳健，不好处在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至于会友个人相互间的态度，主张“互助”“互勉”。众赞成上海的决议。（态度问题解决）主席提出“会友如何研究学术”的问题。毛润之报告巴黎会友对于共同或分别研究

学术的进行（见肖子升来信）。并主张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陈启民云：我觉得环境每把人扯之向下，所以会友集合一处，同居共学，是必要的。集合多人力量去改造环境，要容易些。熊瑾玎谓：同居、开会、两个办法，都是必要。何叔衡主张开办平民饭店，易礼容云：只要能住在一起，即职业不同，亦可以常相聚合。毛润之云：须组织一种公共职业才能同居，现在且讨论怎样研究学术的问题。李承德云：我们不但要研究社会主义，哲学、科学、文学、美学……都要研究。朱子有言：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会友也要采这种态度。我们不妨用种种的手段，去达到目的。毛润之云：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陈启民主张规定一个计划，在本年内研究几个主义，定期得到结果。毛润之主张暂作半年预算，研究五六个主义。何叔衡君主张每月聚会一次，研究有得的可来谈，其余的可来听。彭荫柏谓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皆有研究的必要，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润之申明云：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

以下又讨论如何看书：有主张单独看书以其心得来讲演者、有主张共同看一种书开会时各述所见者，尚未完全决定。惟每月开会一回专讨论学术，则已决定。未决定者，主张俟下次开会再决，新年大会不议（研究学术问题大体解决）。

于是进行讨论“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本来学会会章，久应修正了，前此多人主张把会章改成

简略些，巴黎来信亦主此说。但是日忙于讨论各种问题，要将会章即行修正，实做不到。毛润之主张推定起草员，草定后由长沙方面会友开会表决，再征求巴黎及各地会友的同意。众主张即委职员起草。至于会费的添筹，为刷制会务报告和通讯集，主张每年加收一元（会章及会费问题解决）。

对于“新会友入会条件及手续并出会”的问题，是日讨论决定如左：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即为会友的信条）：（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

新会友入会的手续：五人介绍；通告全体会员（省去由评议部通过，因是日主张不设评议部之故）。

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见下）；（二）会友录里不列名；（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

“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

十年一月二日

（以上会员入会出会问题解决）

一月二号为聚会的第二日，大雪越深，到会者十余人，

(昨日到会者今日均到)因有昨天未到今天到会的人,主席(何叔衡)将昨天讨论及议决过的问题大略报告一番。继续讨论昨天未完的第一个问题:

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用循环发言法,从主席起,列席诸人自左至右依次发言:

何叔衡: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

毛润之: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培道:同上。

陶斯咏:同上。

易阅灰:同上。

易礼容:同上。

邹泮清:我对于改造两字极为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无论什么事,不可一跃而几,是渐渐进化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将各种主义方法彻底研究,看那一种主义方法适宜。东西民族不同,人类病痛极杂,决非一剂单方可以诊好。邹君发言极长。

陈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围较大,可以世界为家,心意愉快的多,故我赞同用“改造中国及世界”。

张泉山:我另有一个主张今可不提,单就方才所说讨论,不宜以中国和世界并举,宜用“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

陈子博: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取急进态度,所以我主张改造。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故我主张删去中国二字,用“改造世界”。

钟楚生:我们目的不妨大点,主张用“改造世界”。

贺延祜:同钟。

彭荫柏: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自愿抛弃昨日

“改造东亚”的话。

熊瑾玎主张用“改造世界”。

刘继庄：同熊。

李承德：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

周惇元：同李。

都发言毕，相互略有批评。主席云：昨日曾言不取表决形式，但事实上无表决则不能明白分别某种主张的多数少数。众赞成表决。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陈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十人）。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祐（五人）。以上二种主张文字上虽稍异，实质实是一致。于是主席又说：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的起立！起立的如下：李承德、周惇元（二人）。周惇元声明云：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使社会进化”两都赞成。此外声明不做表决者有邹泮清、张泉山二人。（目的问题解决）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 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原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的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泮清：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

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祐：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荫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天下不尽是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 W. 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番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做破坏功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

设亦须预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实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彭荫柏谓：一点一滴的改造，亦须趋向共同目的。任培道赞成陈启民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话，惟谓病后宜有补剂，教育是补剂也。邹泮清仍反对改造说，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谓人有人心道心，不能尽善，故须点滴改革。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玎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作工。毛润之谓：人人作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作工。

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克燊、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祐、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泮清。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以上第二日完。中午叙餐。

一月三号，为集会第三日。首先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

何着手”问题，仍依次发表意见：

何叔衡：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如陈炯明之类，亦宜接洽。

陈启民：研究宜重比较，取精用宏。宣传宜兼重知识阶级，使无弃才。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周惇元：从下级入手，宜渐进，重普遍，立脚宜稳，点滴去做。学校和饭店，皆吾人着手处。研究宜深。

熊瑾玎：先研究，而后从事下手之法。下手之法，宜重传播。学校以自办的为好。再则从事普遍之宣传，办报亦其一法。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发财不是为自己而发财，只要有目的，有组织。

彭荫柏：研究、传播、组织、联络，四者都不可缺。研究宜方面多，科学、文学、哲学、经济、政治，不偏废。所以各得互相交换。传播宜兼重知识阶级。组党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联络，则个人，团体，宜兼顾，如少年中国学会，其可联络者。

贺延祐：研究、传播，甚要；尤宜自己投身到劳动界去。

陈子博：自己到劳动界去多发小册子，语言无妨激烈一点。组党分都市、乡村两方面、洪会可利用。

易阅灰：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资取法。

姜瑞瑜：发展个人特殊能力，利用机会。教育宜着重。

张泉山：主客观两方面宜兼重。客观方面分三种方法：

(1)宣传。分为三：(a) 学校；(b) 小册子；(c) 秘密演讲。

(2) 组织。(3) 联络。分为三：(a) 个人；(b) 小团体；(c) 大团体，如俄国。主观方面宜增高个人能力。

陈章甫：研究宜即时着手。宣传如文化书社，最有效力。我县自浏西文化书社成立，教育人员发生极大之忏悔，即其例。须从市民运动入手，多讲演，多联络，联络可仿颜习斋医病教人办法。饭铺、茶店，最好着手。组织菜园，实行从劳动界入手。夜学要多办。联络要自己到劳动界去，并宜及于女界。

邹泮耕：世界是积渐进化的。宜点滴改造，宜温和。从现时现地做起。注意教育实业。办教育实业要资本，但借外资，仍宜反对。宣传着重劳动阶级，为长时之宣传。教育是基本事业，从学校制造同志最为坚强有力，一个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募捐办学校，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由长沙而各省各国，积渐前进。久而可靠。办报注意通俗。

蒋集虚：做事要钱，筹办要从事实业，望各人分工进行。

易礼容：过激主义本不可怕，不研究自然怕他，研究要深切。宣传以诚恳态度出之必有成效。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艺术家以暗示的方法行之。

陶斯咏：我所要说者，宜云：“我个人即刻如何着手？”我的答复是：“我个人要即刻读书”。

任培道：从自己读书做起。

毛润之：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

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依次发言毕，相互讨论，对于所举各种着手方法，多谓宜以必要而且切实可行者为主。主席遂将上面各人所述着手方法，综合序列如左：

着手方法：

1. 研究及修养：

A. 主义；

B. 各项学术。

2. 组织：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3. 宣传：

A. 教育；

B. 报及小册；

C. 演说。

4. 联络同志。

5. 基本金：

组织储蓄会。

6. 基本事业：

A. 学校（又夜学）；

B. 推广文化书社；

C. 印刷局；

D. 编辑社；

E. 通俗报；

F. 讲演团；

G. 菜园。

于是主席赞成上面六项各节为会友进行着手方法付表决，全体起立（着手方法问题解决）。

次讨论会友室家问题：

陈章甫报告巴黎会友来信的内容。并谓会友多感室家的苦痛，急宜设法解决。毛润之谓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青年有室家痛苦的极多，会友中亦大多数有此痛苦。此时不求解决，将来更无办法。相继自述有室家痛苦者多人。有主张组织“夫人改造学校”者，有主张组织“工厂”者，有主张组织“女子工读学校”者，结果照巴黎来信，先组织“妇女成美会”，推举陶斯咏、易礼容、陈章甫、任培道为筹备员，究用何种救济方法，请四人筹商后得有结果，再行商决（以上室家问题解决）。

次讨论“学会纪念日问题”：

一致主张以四月十七日为学会成立纪念日，各地会员是日分别集会叙餐。

次讨论“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大家认此为重要问题。惟“增进健康”一项，如早起，运动，沐浴，节劳、戒烟酒等，不便表决规定，应由会友个人去斟酌力行；但表决“增进娱乐”的各种集会如下：

1. 游江会：阴历五，七，八，三月择期举行三次以上。
2. 游山会：春夏秋三季择期举行三次。
3. 踏青会：三月三日。
4. 聚餐会：每月一次。于每月例会日期举行，每餐各备铜元二十枚。
5. 踏雪会：遇雪临时集会。
6. 毬会：各会员自由组合。

（以上健康及娱乐问题解决）

此外尚有“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及“个性之介绍批评”三个问题，因时促不能讨论。

等本年一月常会解决。

第三日自上午十时起讨论，至下午二时方散。是日全体至草潮门外河干拍照。大雪拥封，照后不现。

一月十六日，为长沙会友十年一月常会期，仍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二十一人。何叔衡主席：报告今天系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问题凡三：（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请大家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

列席二十一人，依次发言：

何叔衡：我的计划狭小，将来仍当小学教员。想在我的本乡办一学校。在三年以内要往国内各地调查一次。同时不忘看书研究。从前想学外国文，但现觉年纪大了，不能学好。然还想学习日本文，以能看日本书为主。做事从最小范围起。

周惇元：目的在研究学术，想于文学及哲学上用一点功，将来事业则在教育。现在进行：想在两年学好英文。前想进学校，今觉中国学校无可进了。想在近筹一点钱赴日本，惟不易办。赴日虽不甚好，但一，可绝外缘，免去在国内时的纷扰；二，日本虽无独立文化，但感受最快，并非无学可求。筹款困难时，或要借助官费。

彭荫柏：从前本想终身站在实业界，所以进了商业学校。后知商业不适个性，便把他丢掉了。从前我有一种野心：学好数国文字；对于形而上学，也想懂得一点大概；又想于

实业上有所贡献，于海外贸易有所进行。但是现在变更了：觉得要使社会改造，非于经济政治上有所改造不可。前想留美，因无钱停止；后又想到法国去；去年以来，又想赴俄；现仍想由法赴俄。在长沙，至多不过两年了。在长沙，除解决自己生活之外，还想帮助劳动组织。求学方面，还是初心，但文字只想学英俄两国了。

钟楚生：我自己觉得只能在教育界生活，并且愿意只在教育界生活。我从前本已进了中学，因故改入师范。师校毕业，因本省高等师范不好，不愿去，因此做了教员。因循至今，随便又是几年。将来仍想在教育上用功。想筹钱到日本去一次。

陈子博：俟中学毕业后再定计划。在长沙时，一面对于社会上做点事，对兵与工，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将自己的功课预备一番。

谢南岭：我认改造社会，应当从最下级——乡村——做起，所以乡村教育，极愿尽力。师校毕业后，决定升学，或西南大学，或高师，或高工，升学毕业后，决在乡村中做事。改变普通人做便宜事做高贵事的心理态度。

张泉山：我从前只有求学上的计划，去年以来，又有事业上的计划了。我对于学问，想从数学、物理学、化学下手。现在有闲就读英文。我于自身生活以外，负担一个老弟的学费，因此当在长沙再留一年半，仍从事教员生活。

蒋集虚：想做一个教育者，从事小学中学的教育事业。师校毕业后，教书，积钱，再入高等师范，然后往外国留学。从事教育时，拟集合同志，自办学校。

毛润之：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

內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罗耻迂：终身事业：教育。教育是为人类的，为社会的，所以对于社会学欲有所研究。研究的方法不能确定，或自修，或学校，或国内，或国外，至于目前，从阴历明年正月起，读英文。在五年以内，要使英文学到可以看书。

夏蔓伯：深信工学并行，与脑体共用之理，想一面研究教育，一面学习工艺，这是目的。方法：第一决定在师范毕业，毕业后任教员几年，教书时并兼从事研究与练习工艺。十年后，再出洋。

邹泮耕：我的计划筹想了多年，几经修正，现在似乎有一点把握了。我意一个人的事业不外研究与发表两节。我个人想研究文学及哲学（广义的），拟以一年温习曾学过的各种自然科学，再以二年习文学，再以一年习英文。这四年中附带教课（不当主任），无课则事研究。四年后往日本，至少住一年，惟不愿进学校，因我从来反对他。以后再以五年求学，详细不能悬拟，或竟赴西洋亦难定。以上是我的十年研

究计划，此后再从事发表。至我不赞成学校，因学校不足成学。

易阅灰：我近来认定我自己最后要做一个教育者。预备工夫，先学外国文；至少学好英文，法文，日文，注重英文。将教育学与学外国文合为一起，看英文教育学。我又认学校无进的必要，决定在半年以内从事教育的工作。每天做四小时工，读六小时书。

陈启民：发言很长，记其大要。陈云：我个人计划，一是终身的，为终身读书计划。这是根据我自己的宇宙观和个性来决定的。我觉宇宙只是空间时间二者，时间是直线，空间是整块，都不是破碎的。我个性则是喜欢多方面。因此觉得宇宙间人之所欲学，皆吾之所欲学。宇宙间人之所曾论思，皆吾之所欲论思。文学，哲学，科学，皆吾之所欲学。我愿做一个学术界的托辣斯。学问暂时不能定系统。升学不升学，出洋不出洋，觉得皆不成问题。因学校不足以范围我，我可以利用学校，所以或者再入学校。至于出洋，世界上学问分两大支，一支属亚，一支属欧。我从前有一种见解，对亚洲想集中研究中国的学问，推及印度，日本。对欧洲则不能说集中哪一国，所以想先研究亚洲学，这是我从前的想法。后来又想用西方的方法，求东方的学问。现在则想东西并进。至将来到外国去，以一国为常驻，以各国为游行，作一个学术界之猎夫。我于升学，不定在哪一年和哪个学校。至读书的时间，原无穷尽，死而后已。以上说终身的计划。再说目前的计划。为经济压迫，不能外出，但这正是成全我，因为我想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学。中国学的下手注重周秦；周秦以下，无学可说。宋受佛学影响，当别论。清为复古时代，自当研究。我想以历史的方法治中国的学问

而集中于哲学和文学二面。我以为冷静方面的学问当在后，人事方面如政治、经济等当在先。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均大规模有组织，所以我对于西方学拟集中于政治、经济的方面。我从前有两年学好三国文字的计划，因事实阻碍，近又订了三年学好两国文字的计划。英文而外法文和日本文都是要学的。

贺延祐：我的计划随时变易，前学师范，无甚计划，毕业后教了几年课，想进高师，未果。现拟学医，因此想学英文、化学、生理学等。因经济不能独立，拟做两年事，集一点钱，再进医校，医系一种职业，可以救人。做事时兼学英文、化学。

吴毓珍：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因无钱恐不能去，现在还是筹钱。一面筹钱，一面读点英文。

陶斯咏：陈先生想做一个学问上的托辣斯，我只好做一个拣煤炭的小孩子。我在师范毕业后，因经济，不能升学，就想教课数年，储金升学，不料至今还是原样。久想邀伴自读，几经没法无成。去年想入北高，未果。去夏至南高想入又未果。以后仍只在周南，一边做事，一边研究，从心理学、教育学和英文入手。同时想联络省城各处女友，我觉求友不一定要求胜己，诸凡有志，即当联络。

任培道：从前许多计划都失败了。先前本想升学，后因经费及地点的困难未能，因决计当小学教员，一求增进经验，一求储积费用。在溆浦数年，亦无成效。去年想到法国去，也因无钱未成。因力辞校事，想在长沙专门对于学问用一点功。既到长沙，也不能实现，现在仍只好一面求职以解决生活，一面学习英文，再等机会升学。

吴家瑛：在学生时代计划和希望很大，及入社会经历数

年，从前计划打消好多了！现亦无具体的计划可说，惟对于学问事业两面，总是抱一种向前进行的意思罢了。

唐文甫：陈君以宇宙是整然的，因此作成他的宇宙观，而立定其计划。我的计划，也立于我的宇宙观，我觉得宇宙只是“美”。我觉得世界没有不美的。凡能引起我的美感的，我就喜欢去研究。文学是能够表美的，诗歌尤其是文学上表美的要品。因此，我欲于诗歌有所研究和创作。不是求名，也不是求利，也不管人人说好说歹，只求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是。此外哲学也想研究，凡求学一要有识，二要有胆，而胆第一，无胆则不能成学。吾原戳破一切，做一个学问上的“冒失鬼”。年半内不出省，一面做一点事，解决生活，一面学英文及日文。年半后或入北大，或进南高，暂不定。自揣个性近于文学，将来想专力于此。

熊瑾玎：我觉要做事，就要有钱，因此我就早有发财的念头，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货殖传》……看，常觉在中国这种社会底下发财有两条路：一是做官，二是经商。做官要钻营，不愿干。经商我也试验了一下，因他种原因，停了。现在想从生产事业下手，从前与肖子升等商量到东三省垦荒，因各种困难未成，现在正筹度他种方法。我觉私利可以不要，团体资本是该要的；增进我们的资本，方能发展我们的事业。苟可发财，不必择术。

以上个人的进行计划发表完。从前的朋友们，多将自己的计划看成秘密，不肯把他公开出来，因此别人不晓得他的计划，他也不晓得别人的计划，各人都打入闷葫芦里，要互助也无从互助，要结合同目的的人共做一样事也无从结合。这种“各想各”“各做各”的现象之结果：一，自己的计划如果偏了或错了，因无从得到纠正，便一直偏错到老死，所

志无成，徒增怨悔。这类情形，是我们时常看见的。二，自己的计划虽未偏错，而孤行无助，终归不能达到，这类也是常有的事。长沙同人鉴于此种弊失，乃有各述计划之举。各地会友均若能同样举行，各述自己计划，以其结果刊登会务报告，大家看了，当可得到种种益处。

上面个人计划述完，休息二十分钟，继续讨论第二个问题：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

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大概从前的读书人，是照例不研究生活方法的；因此，竟弄成凡读书人社会就是无恶不作的坏人社会。吃饭问题，本来不容易解决，加以不研究，更不得不寻些糊涂方法去解决了。新民学会长沙会友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除开一，二人有别种理由，不主张注重生活问题之外，其余对此问题都觉很重要。讨论情形特记如次：

何叔衡：自身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至于别的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

彭荫柏：常有三个问题，即求学，做事与生活，都难解决。但我觉得人只要有勇气，不应计及生活问题上去。罗素说：“应当想生活问题以外的事”，我很相信。我们只要把求学做事的问题解决，生活不成问题。但我们生活，也要定一方向。许多方面的生活。如做官之类，我们不可去。只有教育界（除开别的新组织新生活）和作工，为我们所可采的方面。作工也有为难的地方，因为劳动界太无识了。所以我们做事，当有新组织才行。

唐文甫：在我们求学时，专心去解决生活问题，恐怕会

要墮落，解决不了，便生烦闷。我现在在《民治日报》帮编新闻，一面不费多的时间，一面可以得到小许报酬，用以生活并买书报。将来拟从事这一类一面可资生活，一面便于研究的事。

陈子博：虽略有遗产，但父亲专制，不能容我自主；要脱离此种痛苦，非独立生活不可。现学未成，仍然困难。寒暑假中拟在文化书社服务，以所得工钱，供给学费。毕业后生活方法，要俟将来决定。

周惇元：暂任报馆事，解决生活。将来很想一切事不做，专门读书。但款须另筹。

张泉山：以教员为职业。

钟楚生：以教员为职业。

谢南岭：家寒，但能耐苦，物质上的生活很易解决。然无钱买书，将来升学，也很为难。近来想组织一个小小的工场，或印刷所，来解决生活。

夏蔓伯：我自己现在是一个寄生虫；不惟自己：身上又有了两个寄生虫——妻、女。将来个人的生活方法，想从事手工业。现在师校尚未毕业，拟于年内着手办一小印刷局，以所获供给用项。毕业后以教员维持生活。家里有一父、二妹、一妻、一女；除父外，通是不生产者；故家庭生活，甚是危险。

易阅灰：我于消费，主张适当，不太奢，亦不太啬。饭取可口，衣取章身，房子求卫生通光气。至取得生活费的方法，暂为教员月薪，支出恐怕要以买书费为多。

贺延祐：生活暂时尚无方法，计划想学医，不能之时，仍在教育上做事，半工半读。消费不主太简，食住总以能卫生为好。衣以保暖为宜。

熊楚雄：单是一个人的生活不成问题。我们生活所以难解决者，就是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子弟。生活的方法，要想法子开辟。例如：“送灰面”、“添洋油”两件小事，从前没有人干，经人开辟了，就是很好的生活方法。我们如果没有一点事做，也可以自己开辟途径。我对于生活费的使用，不大喜欢俭啬。因为生活奢一点，欲望必定也大一点，做事必定也勇一点。

毛润之：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罗耻迂：生产方面：在教育上生活。消费方面：量入为出，不必俭。除自己解决生活外，还要解决家庭生活。

蒋集虚：物质生活，不外衣、食、住三项。现我决定家产一点不要，师校毕业后以教员为职业，与相知之数友同居生活，生活费互助，轮流升学。衣则十年内决定只穿布衣，食则每日一餐也可，住屋更可随便。至精神生活，则急要读书。我从前觉得人生无味，盖进化无已，没有底境，使人迷茫，觉得无味。近受杜威、罗素的影响，将凡事之无希望的方面，黑暗的方面，坏的方面，不去着想，专想有希望的方面，光明的方面，故觉颇有生趣。

邹泮清：因要读书，生活问题也不得不计及一番。以我家论，本可自给。但能自己给书报费则更好。至于将来完全读书时期，便为难了。

陶斯咏：现在的生活：教书，学校办事。教书和办事的生活难靠，则烹饪，裁缝，编物。物质生活不困难；但自己

不善理财，有钱不能储蓄。精神生活是一难事，因为要有学问才行。精神如鱼，学问是水，有学问精神才得愉快。

陈启民：精神生活，先前所说可以见大概，不重述。物质生活非个人所能解决，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生活的命。生活上太枯焦，太刻苦，必影响于心理。所以我们身体上所需，必不可故意刻减。饮食衣服住居，都要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虽不要奢，总要“备”。生活的全体，非个人所能解决，个人只能尽力之所能去做。

任培道：现时生活，可以教书解决，衣食能安淡泊

此时，吴德庄因事先去。各人依次述生活方法毕，互有讨论。周惇元云：劝善规过，最是要紧，我常感觉到虽时常有朋友谈论，总多闲谈，少有用诚恳的态度来讨论修学立身的问题的。希望会友注意此点，会面不为闲谈，劝善规过，讨论问题。又觉得我们在此时应该注重“自己改造”，不应加入团体太多，至牵涉许多事务，妨碍自己的进修。蒋集虚极赞周君的话，说：“应该如此”。陶斯咏云：我总加入了七八个会，以后当辞去四五个。何叔衡云：朋友会面，宜多批评。至生活的切实方法，还须大加研究。毛润之不赞成熊瑾玎之消费主张，谓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本体内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袭来。此时何叔衡提议：想一个公众的生产方法。谓刚才有人提议办印刷局，我以为可以商议进行。毛润之云：文化书社有此计划，因“书社”只是发行一部，还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一个编译社。夏蔓伯谓：如有人帮助组织，愿任进行。大家认此事甚属要紧，结果：决定另进筹议。“个性之介绍及批评”，因时间不早，未议散会。

各会友鉴：

第三号会务报告，大略要本年年底才可编印。至通信集第四集稿已齐，本年八月可出。第五期的信稿，亟盼陆续寄到；极随便的信，极短的信（如明信片）均请寄来。来件请寄长沙文化书社。

北京政变与商人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这次政变发生，惊醒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上海总商会复于六月廿三日经会员大会议决，发表对全国国民的宣言，这个宣言里说：

“用敢掬诚宣告中外，自本月十四日起，所有曹银高凌蔚等因僭窃政权对内对外种种行为，凡我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除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请各自维持其境内之治安以维现状外，其善后建设事宜，谨当与全国国民共谋解决。”

总商会同时议决否认“不能代表民意”的国会，并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以为积极解决国事的机关。上海各马路商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这次举动，总算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

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大家知道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商人之迫切要求裁厘加税，是他们利喜切肤的表示；但裁厘加税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因为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假使把厘金通通裁掉了，结果是军阀一天一天瘦而商人一天一天肥，那时商人起来推翻军阀真是只要“一声喊”，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聪明的军阀决不做这样蠢事；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了，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狡猾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更决不做这样蠢事。所以裁厘加税，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简直是有生死关系，断不是黎元洪一纸稽滑的起身炮命令所能做到的。我们再看最近上海纱商要求国家发纱业公债为曹锐靳云鹏破坏，要求国家禁棉出口又为外国公使团破坏，更足证明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这些都是上月二十三日到了上海总商会会员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斋先生们亲自尝到了苦味！

商人们历来“酷爱和平”，未想到政治的改造需要革命，不是几个“裁兵制宪理财”的电报所能收效；更未想到

革命须要自己出马，号召组织全国国民，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革命的实力；甚至以为改造政治不必需要一个政党，而怪国民党之努力革命为多事；商人们从前这些幼稚而且怯懦的心理，试将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岂不要哑然失笑？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近来美国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琨去抢夺政权，以及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我们从这次上海商人对于政变的举动看来，知道他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至其对于美国阴谋侵略中国的愤恨，我们从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反对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乘我国民于民治运动奋斗期中，高唱隐含共管中国的论调，而以中国商会及银行界已予同意之谬说，建议本国政府”的文电看来，“中国商人媚外”的恶名，至少也洗去了一部分。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上海以外的商人都一齐起来一致行动。现在的时候是火烧眉毛尖一样的迫切，再不容我们躲懒睡觉，现在是要团结全国国民实行做革命运动，更不容于商人之中还分出派别。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汉口的商人不为吴佩孚所劫持，一齐起来和上海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末了，我们还有须警告全国商人的：第一，革命的大业不是容易的事，在向来外力军阀两重压迫革命的中国环境里更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要实践总商会“全国国民解决”的宣言，不要再蹈从前商教联合会拒绝工人加入的覆辙。第二，现在商人们既已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就要赶快去踏上第二步，坚持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办法，整严步法，努力向前，不达目的不止；切不可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路上去。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选自《响导周报》1923年第32期）

“省宪经”与赵恒惕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自湘西问题发生，赵氏地位动摇，不能不假省宪以自卫，故前数日即令其党羽方克刚、李济民等以金钱买公团通电，或作一群众运动……寓拥护赵氏于维持省宪之中……定五号午前八时举行游街，……彼辈发信以工人团体为

多，以为工人头脑简单，必有千余人可来，詎是日候至十时，不特无一团体到会，即私人参与者亦只彼辈亲朋数人而已，彼等焦急万分，乃派人四出，至素为匪徒包办之中华工会及养济院佛化讲演院等处，每人大洋五角，并备点心一餐，雇请百数十人，于十二时出发游街，游街之先，在教育会幻灯场开会，一堂和尚叫化等共一百二三十人。首由：

（1）和尚炽培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省宪法不如谓之省宪经，如佛家之有佛经……坐中和尚叫化即两手乱舞；

（2）散会后出发：

前有大旗二面——一书省宪维持会——一书省民请愿大会；

第一队——为长衫马褂队，俨然省民代表，约二三十人；

第二队——中华工会，约五六人；

第三队——佛化讲演团，光头青衣，约四五人；

第四队——养济院，约四十人；

五光十色：演此丑剧，尽滑稽之能事……”（见民国日报）。

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湖南最是个明证。赵恒惕现在堂哉皇哉兴“护宪之师”了，而他两年来——有省宪以来——惨杀劳工（黄庞等），勒封报馆（大公报，自治新报，新湘报），剥夺人民书信自由（邮电检查员未曾撤去一日），剥夺集会结社自由（封人力车工会，封碾谷工会，封外交后援会，多次禁止学生工人的集

会)庇护其军队贩卖栽种鸦片烟,贿买选举(派遣属员私造省宪的总投票,用钱私造省议会,用钱买得省长),向商人勒捐(长沙总商会会长,屡被迫逃),向农人提征田赋(有些县提征到民国十七年),破坏法定的预算比例,减教育实业费,增加军费,勾结吴佩孚肖耀南:何一不是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他这次兴师动众,也是和蔡钜猷争鸦片税(所谓特税)起始。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选自《响导周报》1923年第36期)

纸 烟 税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时常说: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或者有人不相信,我们也时常说:外国人(尤其是英美)的假亲善只是想借“亲善”两字好多量压榨中国人的膏血,或者也有人不相信。自禁棉出口令遭洋大人反对而取消,可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现在又来了洋大人压迫政府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可更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申报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电:“阁议,英美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捐,结果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征收纸烟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六月三十一日杭州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电:

“窃维奢侈征税为各国之通例。近年卷烟盛行,以吾浙论,每岁销场竟逾千万,消耗之钜骇人听闻,流毒之烈不

减鸦片。当局有鉴于此，特命设局征收，化无益之消耗，作修路之正用。乃闻外商借口条约权利叠与政府交涉，殊不知此种特税，完全取诸吸户，与烟商毫不相涉；纯粹浙人所输之捐，外商又劳干预！且系国内行政主权，断不容外人侵犯，自应据理力争，勿任有所借口，主权幸甚。”

原来英美据了协定关税条约，不计中国对外来奢侈品自由抽税，任凭是“纯粹浙人所输之捐”是“国内行政主权”，只因为是对外国货，所以到底不许抽税。

英美烟公司所出的纸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运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雇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内地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约”出了一点轻微的税，大批运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许中国“自由”抽税了。浙江一省销纸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销纸烟总额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外国人向我们“亲善”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选自《响导周报》1923年第38期）

英国人与梁如浩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利害的？

办理威海卫交涉的人：一个是独办梁如浩，一个是帮办陈绍唐。据陈绍唐在山东旅京同乡会宣布梁如浩罪状说：“梁督办居心媚外，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岛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军事上甚巨，梁氏甘心卖国，以无条件的交还，变而为继续的租借，且从而为永远的租借，无非另有交换，专谋利己。……梁氏恨余破坏其卖国阴谋，始则托人向余疏通，饵之以利，力言余个人一切开支将来均可代为报销，且结束后之种种利益，亦可分润。经余屡次拒绝，且仍要求其完全公开，梁氏知余不可以利动，乃继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梁氏往往拍案厉声向余曰，此事我有全权办理。往往指挥左右将余扶出门外。余愤不可遏，曾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随手取一砚即欲向头自击，某英人观之大惊，向余劝阻，梁氏毫无所动也。……。”

梁如浩与英人所订之威海卫草约计甲乙丙部二十三条，八月二十三日济南国民大会已经指出其丧权辱国重要的地方

出来了：

（一）变接收为续租：草约允许英国续租十年，十年后有展期续租之权。且将历来未经租于英国之威海卫城，一并划为特别区域而续租之。

（二）断送领土领海：草约规定（1）中国地方长官应换给英国原租人“永租”凭照；（2）按照外人永租华地向来办法，不收任何手续费；（3）英国保留官地，中国不应收用；英国租出之地中国应予承认。其断送领土为如何。草约又规定：（1）刘公岛海面之抛锚所，须俟英国海军不使用时中国方得使用；（2）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派兵登岸操演打靶；（3）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抛锚所拖至外海操演。照此规定，英国占刘公岛及其海面，其陆战水战各队得自由出沒于我领土领海。

（三）断送国家主权：草约规定刘公岛威海卫间一并划为特别区域，既不统属于山东地方，又非真正属统于中央政府。我政府名义上虽得委派政官，然警察须由英国人统带，财政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管理，市政则由中英合组之中英委员会办理。我国委派之行政官不过徒拥虚名，担负英国债务之偿还及公费之筹备而已。威海卫竟做了香港第二，国家主权完全断送。

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了我们的在那里？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威海卫交还是要把威海卫作为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满仍要强迫续租；要求广九路与粤汉路接轨欲置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经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议则主张以研究厘金问题为限（八月二十六日伦敦电）；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铁路共管案来了。迷信华盛顿会议

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那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

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

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

（选自《响导周报》1923年第38期）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节录）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选自《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第12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农民问题》丛刊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都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它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实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那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分，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分。换句话说，即是那一个陈炯明势力减削的县分，必是农民起来的县分。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

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的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已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蝟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人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随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两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工会等对北

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来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组织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收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积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工作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

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也没有，今有了这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查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民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到五种（第二十二种至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虫害，技术拙劣，生产缩减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个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是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的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立刻能办到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予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精髓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内中表现得特别的尤在政治斗争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予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得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来看，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运

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的翻过来。本书内唯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选自《农民运动》第八册）

土 地 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制，在井冈山）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 （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
- （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垌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

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区）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土 地 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

(一) 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二) 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沒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 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 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 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 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 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 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 以乡为单位分配。(2) 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 以区为单位分配。以上三种标准，

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

标准。

(五) 山林分配法：

(1) 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 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 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六) 土地税之征收：

(1) 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 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 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 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 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共产党红军 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二、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之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甲）党的组织路线

（1）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伙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2）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方法。

(3) 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的将各种工作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的混合编制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乙) 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1) 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一) 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二) 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

(三) 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的放松了。

(四) 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五) 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

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一般的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六）支部大会与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2）纠正的路线：

（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 政治观点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
2. 忠实；
3.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 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事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将对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他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的举行起来。

（四）严格的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

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员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的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的督促开会。

（丙）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1）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一）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人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二）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三）负责人事前没有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

意见。

(四) 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误，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五) 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2) 纠正的方法：

(一) 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二) 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三) 决议不要輕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四) 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五) 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六) 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仅不要大杀风景地去遏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能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七) 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是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丁) 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1) 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因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2) 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的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

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为单位经常有计划的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3）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戊）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员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党的工作的任务。

（己）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庚）士兵会党团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三、党内教育问题

（甲）意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之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

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乙) 材料

- (1) 政治分析；
- (2) 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讨论；
- (3) 组织常识；
- (4) 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
- (5) 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
- (6) 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 (7) 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整研究；
- (8)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 (9) 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 (10) 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丙) 方法

- (1) 党报；
- (2) 政治简报；
- (3) 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 (4) 训练班；
- (5) 有组织的分配看书；
- (6) 对不识字的党员读书报；
- (7) 个别谈话；
- (8) 批评；
- (9) 小组会；
- (10) 支部大会；

- (11) 支部委组联席会；
- (12) 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 (13) 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 (14) 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 (15) 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 (16) 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 (17) 政治讨论会；
- (18) 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甲) 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剥削红军的势力。

(乙) 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1) 宣传内容的缺点：

(一) 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二) 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三) 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四) 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五) 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六)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七) 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等）的

宣传；

(八) 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2) 宣传技术的缺点；

(一) 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个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份太差，俘虏兵也有，伙伕马伕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器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二) 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三) 壁报出的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四) 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五) 画报只出了几张。

(六) 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七) 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八) 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九)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较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十)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十一) 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十二) 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丙) 纠正的路线

(1) 宣传内容方面：

(一) 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二) 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的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三) 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四)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要求，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做普遍的宣传。

(五) 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做好对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六) 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

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游民生活与性质之不同，分别的对他们宣传。

（七）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八）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蒋汪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2）宣传技术方面：

（一）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重要的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组织：

子、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丑、各支队宣传队，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

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寅、宣传队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卯、改造宣传队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二）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

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一项重要。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三）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子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一、国际国内政治消息；二、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三、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该当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一点，要清楚点。

（四）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材集中工作。

（六）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

化装宣传。

(七) 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八) 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九) 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

(十) 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去执行。

(十一) 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十二) 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单，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到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途党部及群众机关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的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查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的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资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

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人受伤官长亦然。

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甲、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的编制课本，作对士兵训练的材料：

- (1) 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 (2) 土地革命各方面；
- (3) 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 (4) 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 (5) 早晚点名口号；
- (6) 识字运动；
- (7) 怎样做群众工作；
- (8) 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 (9) 各种偏向之纠正；
- (10) 苏联红军；
- (11) 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 (12) 红军白军比较；
- (13) 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 (14) 革命故事；
- (15) 社会进化故事；
- (16) 卫生；

(17) 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18) 革命歌；

(19) 图报。

乙、方法

(1) 上政治课：

(一) 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伙，马伙，伙伙，均须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的政治常识。

(二) 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挑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材，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三) 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有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备将来有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四) 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会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五) 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六)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 2、由近及远；
- 3、由浅入深；
-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 5、说话要明白；
- 6、说话要有趣味；
- 7、以姿势助说话；
-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 9、要提纲；
-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2）早晚点名说话：

（一）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超过半小时；

（二）材料：

- 1、报告政治消息；
- 2、批判日常生活；
-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3）集合讲话：

（一）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二）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的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三）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四）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4）个别谈话：

（一）对下列各种人必须和他做个别谈话：

- 1、有偏向的；
- 2、受了处罚的；

- 3、伤兵；
- 4、病兵；
- 5、新兵；
- 6、俘虏兵；
- 7、对工作不安的；
- 8、思想动摇的。

(二) 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三) 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谈话。

(四) 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5) 游戏：

(一) 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 1、捉迷藏等；
- 2、打足球；
- 3、音乐；
- 4、武术；
- 5、花鼓调；
- 6、旧剧。

(二) 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三) 游艺设备费用由公家支給（大队的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6) 改良待遇：

- (一) 坚决废止肉刑；
- (二) 废止辱骂；
- (三) 优待伤病兵；
- (四) 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7) 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一) 把红军生活习惯如：①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②三大纪律及其理由；③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④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⑤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⑥废止肉刑辱骂；⑦优待俘虏等项，讲给新兵们俘虏兵们听。

(二) 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三) 红军的宗旨：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3、红军三大任务。

(四) 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五) 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甲) 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乙) 每个纵队内设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丙) 由公家出钱备置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七、废止肉刑问题

甲、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欢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肖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长官，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恨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乙）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的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有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利和

依于这个权利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群众的广大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的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份，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依然很浓厚的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果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丙）纠正的方法

（1）坚决的废止肉刑。

（2）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的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3）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藉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

护了它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藉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运动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4) 红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一) 修改红军惩罚条例；(二) 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三) 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四) 一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的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到达肉刑废止后的良好收获。

八、优待伤兵问题

(甲) 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1) 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的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2) 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注意不充分。如(一) 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二) 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厌他们的态度。(三) 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怒骂，或无情的驱逐他们。

(三) 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

沒有衣服換，調養費，病官有，病兵沒有。

（4）蛟洋醫院的缺點：（一）無組織狀態；（二）醫官和藥太少；（三）醫官賣私藥；（四）不清潔；（五）御寒衣被不夠；（六）看護兵太少；（七）飯食惡劣；（八）房子窄；（九）與當地群眾關係不良，以致傷病兵看醫院如牢獄，不願留在後方。

上例各種對傷病兵的待遇不良，便發生了下列影響：

（一）使士兵不滿紅軍，“紅軍好是好，就只不要帶花，不要病”，這種輿論簡直普遍全體士兵以及下級官長之中；

（二）士兵和官長不滿意，越發增加官兵間懸隔；（三）士兵及下級官長都怕帶花，因此，減少紅軍戰鬥力；（四）逃兵多；（五）影響工农群眾，減少他們加入紅軍的勇氣。

（乙）解決的辦法

（1）軍政機關對於衛生問題，再不能象從前一樣不注意，以後各種會議，應該充分討論衛生問題。

（2）衛生機關的組織應特別使之健全，辦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別地方用不着的人塞進衛生隊去。並要增加辦事人，達到照料全備之目的。醫生和藥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設法解決。對於醫生，應注意督促他們看病詳細一點，不要馬馬虎虎。

（3）官長，特別是和士兵接近的連上官長，應當隨時看視病兵，送茶水給他們吃，晚上替他們蓋被窩。他們覺得冷，要替他們想辦法，如向別人借，增加衣服。以上這些照護傷兵的方法，要定為一種制度，大家實行起來，因為這是最能取得群眾的方法。

（4）對行軍時，沿途落伍的傷兵：1、禁止任何人對他們的怒罵和讖笑；2、傷病兵讓路的時候，要好好對他

说，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论那一个部队和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需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5）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兵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6）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精神的好方法。

（7）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甲）在高级地方政权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的执行工作。

（乙）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1）凡有红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2）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项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没有建立以前，均系政治部职权。

（3）凡没有建设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当地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

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与红军政治部会商的方法处理之。

（4）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需尽可能的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丙）红军里面用人之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助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丁）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用阶级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戊）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

（己）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的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向政治部支给。

（庚）军事机关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选自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
编的《毛泽东选集》）

反 对 本 本 主 义

(一九三〇年五月)

一、沒有调查，沒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沒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沒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平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方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

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¹⁾，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么？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

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么？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

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²⁾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 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 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地都注意调查工作了⁽³⁾，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象挂了一篇狗肉账，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份，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

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

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⁴⁾，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⁵⁾保障了永久的胜利，

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得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

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注 释

〔1〕 见《论语·八佾第三》。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2〕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3〕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4〕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5〕 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东塘等处调查（节录）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了诱敌深入方针。十一月六日红军从峡江渡赣江往永丰、南城，

我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十一月七日宿东塘，第二天到吉安，沿途做了一点简略调查。在李家坊调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木口村调查（节录）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藤田，会合红军主力。二十一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兴国调查（节录）

（一九三〇年十月）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凌源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三坑区为第三乡，江团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形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

查，就沒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沒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沒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沒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沒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领，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们。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

※

※

(一) 田地分配

照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情形来说，旧有田地的分配如下：

地主 百分之四十

公堂 百分之十（为地主富农所共有）

富农 百分之三十

中农 百分之十五

贫农 百分之五

(二) 人口成份

兴国第十区人口成份大略如下：

地主 百分之一

富农 百分之五
中农 百分之二十
贫农 百分之六十
雇农 百分之一
手工工人 百分之七
小商人 百分之三
游民 百分之二

依上所述，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占百分之十五。平分土地，中农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对于他们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土地。那些平分要损及中农的说法是不对的。

此处人口成份的分析，是以家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雇农百分之一是指完全的雇农，那些贫农兼雇农的虽为数不少，不在此例。小商人百分之三是指完全的小商，那些半农半商的不在此例。游民百分之二是指完全失业靠赌钱做土匪等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业的不在此例。

为什么地主人口只占百分之一？因为本区占有土地的地主，多住在邻县之白鹭区、田村区及本县之县城的原故。若把他们算进来，大概地主阶级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或三。

（“本区旧有土地关系”）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寻 乌 调 查（节录）

（一九三〇年五月）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洲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

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沒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今年的选举) 节录)

(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革命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用苏维埃这个武器去对付内外一切反革命，这就是苏维埃第一个作用。因为必须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阶级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在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的报告，
选自《红色中华》第108期)

长冈乡调查 (节录)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

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已足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 ※ ※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七人，小乡五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任，十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五条议事日程应取消，为什么不把那张开列了具体问题的单子贴出来呢？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八个月后才改选，太迟了。代表调动了工作，即刻补选是对的，但不应称为“代理代表”。（“代表会议”）

※ ※ ※

长冈乡此次选举的缺点：（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

（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此次选举”）

※ ※ ※

长冈乡的村委员会（许多的委员会在村都有），使苏维埃连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五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五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五个人，其中四个就是四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

做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种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此外应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这些，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上面，已经规定了。（“乡苏下的委员会”）

※ ※ ※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群众生活”）

※ ※ ※

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因此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

解决了。 （“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

※

※

※

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公债的推销”）

※

※

※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妇女”）

※

※

※

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间的竞赛。因此每一竞赛条约的订立，应召集村为单位的群众大

会作报告，得到群众的承认，并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在生产问题等项的竞赛上，还应召集每个代表领导下的几十个居民开会作报告，得到他们的承认。一时期内检查成绩的结果，也应该召集这样的会作报告，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一切竞赛没有成绩的，都是由于只把竞赛条约放在少数人的袋子里，没有推动广大的群众。每一次竞赛，都要作出总结，并且给奖。长冈乡的两度竞赛，对于这些大体上做到了，所以他们得到了实际的成绩。 （“革命竞赛”）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才溪乡调查（节录）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分为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上屋（六百）。

乡苏常驻人：主席、文书。

因是大乡，文书常驻，帮助乡苏工作。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

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发坑

（八百）、孙屋（七百）。 （“行政区划”）

※ ※ ※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象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代表会议”）

※ ※ ※

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乡苏下的委员会”）

※ ※ ※

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

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象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扩大红军”）

※

※

※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沒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沒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

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象说国内战争中经

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象说苏区群众生活沒有改良，如象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沒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爭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经济生活”）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

（一九三四年四月）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外务省于四月十七日发表为对华政策致列强的通牒后，各帝国主义都从他们自己在华势力范围的利害关系上宣布一些不满的意见，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也马上发表了最无耻的卖国言论。《红色中华》社记者为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于此事的表示，特往访主席毛泽东同志，据谈：

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在这通牒上，日本帝国主义明白的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的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将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力量，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方，来进行反苏联的战争。日本帝国主

义这一企图，虽然遭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对；但是他们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至于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和加强反苏联战争的后方，各个帝国主义与日本当然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表示最无耻最可怜的，就是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言人，于十九日表示了卖淫妇那样可丑的声明书，认为国民党政府“对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宁”，就是说，“提倡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瓜分中国，与保障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安全，是国民党应有的义务”。当然国民党“从无欲中伤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心”，而且国民党慎重的向日本声明“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用外国军事教官或专家，亦仅是为国防上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然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国民党从英，法，日，德，美，意各国所借的债款，和买来的军用品并没有用过半个铜板或一个子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满州和华北以及英，法帝国主义强占藏，康的暴行。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投降与妥协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国防。但是，国民党所谓“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实际上就是镇压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进攻。卖国罪魁蒋介石把全国正式军队百分之六七十调到江西来，进行第五次“围剿”，正是表明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尽清道夫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向日本声明时，已经特别着重的提出来了。并且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声明了，国民党对于日本“倘有不平之事态可予纠正，中日之关系可令其改善而顾及两国之共同愿望”。这是充分表明国民党走狗之奴隶性。国民党深恐不能完善的尽其狗职，

不能博得每个主子的欢心，所以才向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摇尾乞怜。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工农劳苦群众与工农红军，坚决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线电播音听不清。——编者）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的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才能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选自《六大以来》（上册）第620页）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坚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一些腌腌臢臢的东

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任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选自《革命老人徐特立》，工人出版社，
1959年11月出版。）

辩证法唯物论提纲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

第一章 唯心论与唯物论

本章讨论下列各问题：

-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的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

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这些人们的意识，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社会根源，存在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构中。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发展，促使科学知识也随之发展，唯心论理应衰退，唯物论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论不但不会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论竞长争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于社会有阶级的划分。一方面压迫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心论学说，一方面被压迫阶级同样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物论学说。唯心论和唯物论学说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战是不会消灭的。唯心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则是革命阶级的宇宙观，他在阶级社会内，从对反动哲学的唯心论之不断的斗争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由此，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始终反映着反动阶级与革命阶级在利害上的斗争。哲学中的某一倾向，不管

哲学者自身意识到与否，结局总是被他们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助长着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意义下，哲学中的一定倾向的贯彻，便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之特殊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特征，在于要明确地理解一切社会意识（哲学也在内）的阶级性，公然声明他那无产阶级的性质，向有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那里呢？在于对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论认精神（意识，观念，主体）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物质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来。

在唯心论看来，世界或者是我们各种知觉的综合，或者是我们的或世界的理性所创造的精神过程。对外面的物质世界，或者完全把它看成虚构的幻像，或者把它看成精神元素之物质的外壳。人类的认识，是主体的自动，是精神的自己产物。

唯物论相反，认宇宙的统一就在他的物质性。精神（意识）是物质的本性之一，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质，客观世界，存在于精神之外，离精神而独立。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唯心论认物质为精神的产物，颠倒着实在世界的姿态。这种哲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何在？

前面说过，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但在生产发展之后，促使唯心论形成哲学思潮之首先的条件，乃是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发生分工，分工再发展，分出了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们。但在生产力贫弱时期，两者的分裂还没有达到完全分离的程度。到了阶级出现，私产发生，剥削成为支配阶级存在的基础之时，就起了大变化了。精神劳动成为支配阶级的特权，肉体劳动成为被压迫阶级的命运。支配阶级开始颠倒地去考察自己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劳动者给他们以生活资料，反而是他们以生活资料给与劳动者，因此他们鄙视肉体劳动，发生了唯心论的见解。消灭肉体与精神劳动的区别，是消灭唯心论哲学的条件之一。

使唯心论哲学能够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的还在于这种哲学意识地表现剥削阶级的利害。唯心论哲学在一切文化领域的优越，应该拿这个去说明。假如没有剥削阶级的存在，唯心论就会失掉它的社会根据。唯心论哲学之最后消灭，必须在阶级消灭与共产主义社会成立之后。

使唯心论能够发达，深化，并有能力同唯物论斗争，还须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找寻其根源。人类在使用概念来思考

的时候，存在着溜到唯心论去的可能性。人类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二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性质的事物，一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例如“延安是城”这个判断）。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把一般同特殊脱离开来，即把一般当作客观的实体看待，把特殊只当作一般之存在的形式，这就是一切唯心论者所采取的方法。一切唯心论者，都是拿意识，精神或观念来代替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从这里出发，唯心论便强调着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他们不能指出意识受物质限制的这种唯物论的真理，却主张只有意识是能动的，物质不过是不动的集合体。加上被阶级的本性所驱策，唯心论者使用一切方法把意识的能动性夸张起来，片面地发展了他，使这一方面在心智之中无限制的胀大成为支配的东西，掩蔽着别一方面，并使之服从，而把这一人工地胀大的东西确定为一般的宇宙观，以至化为物神或偶像。经济学上的唯心论，过分夸大交换中非本质的一方面，把供求法则提高到资本主义的根本法则。许多人看到科学在社会生活上发生了能动的作用，不知道这种作用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规定与限制，而作出科学是社会发动力的结论。唯心论历史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蒋介石说要复兴民族惟有恢复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张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我们的思维不能一次反映出当作全体看的对象，而是构成一个具有接近于现实的一切种类的无数色调的、生动的、认识之辩证法的

过程。唯心论依据于思维的这种特性，夸大其个别方面，不能给过程以正确反映，反把过程弄弯曲了。列宁说：“人类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这一曲线之任何一段，都可以变为一段单独的完整的直线，这段直线就有引你陷入迷阵的可能。直线性和片面性是见树不见林和呆板固执性，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这些就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根源”。哲学的唯心论是将认识的一个片段或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张成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唯心论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很对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没有强调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仅给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镜子看。机械唯物论对唯心论采取横暴的态度，不注意其认识论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论。只有辩证唯物论，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的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的克服唯心论。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承认离意识而独立存在于外界的物质是唯物论的基础，这一基础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到的。劳动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使人类逐渐从迷信与妄想（唯心论）脱离，逐渐认识世界之本质，而到达于唯物论。

屈服于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简单工具的原始人类，不能说明周围的事变，因而求助于神灵，这就是宗教同唯心论的起源。

然而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

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地存在着。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间互相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考虑形势，估计力量，建立计划，在他们的斗争成功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被压迫阶级因为采取错误的计划而失败，又因为改正其计划而成功，使他们懂得只有主观的计划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与规律性的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目的。

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而到达于唯物论的结论。

总之，人类的实践史——向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思想工具——唯物论哲学。社会的生产发展越发进到高度，阶级斗争越发发展，科学认识越发暴露了自然的“秘密”，唯物论哲学就越发发展与巩固，人类便能逐渐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

资产阶级在为了向封建阶级斗争的必要，及无产阶级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也曾经找到了并使用了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也曾经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直至他们自己变成了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时，才放弃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个工具——哲学的唯心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戴季陶、吴稚晖，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及其以后思想的变化——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变化，就是眼前的活证据。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他们本质上是唯物论

的。但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唯物论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是更彻底更深刻的，只有辩证法的性质，没有机械论的性质。无产阶级吸收了人类全部历史中一切实践的成果，同时又由于自己的实践，经过他们的代言人与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之手，造成了辩证法唯物论，不但主张物质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质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

这个题目中准备讨论下列各问题：

-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
- 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 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 四、哲学对象问题；
- 五、物质论；
- 六、运动论；
- 七、时空论；
- 八、意识论；
- 九、反映论；
- 十、真理论；
- 十一、实践论。

下面简述这些问题的观点：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这个问题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这里再简单地说一点：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历史给予无产阶级以

消灭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得真正客观地被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与最革命的阶级；又一方面，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末，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之简单的继承者，它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

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不但继承了唯心论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说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说的唯心论，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又不但是一切过去唯物论发展的继续和完成，同时还是一切过去唯物论的狭隘性之反对者，即机械的直觉的唯物论（主要是法国唯物论与费尔巴哈唯物论）之反对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的、有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

中国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虽还在青年的阶段上，然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发展，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的指导中国革命向着

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三、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心论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实质只在于它的“方法”，他们把方法从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辩证法从唯物论割裂开来。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辩证法，而是唯物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他的宇宙观的。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论者却又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看作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去了它的辩证法，而且认为这种宇宙观就是机械的自然科学之各种结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简单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这两种割裂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

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列宁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科学来看的）唯物辩证法看做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法则及（在辩证法的各范畴中反映这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法则的学问。他说：论理学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问。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之发展法则的学问，即关于世界的一切具体内容及其认识之发展法则的学问。换言之，论理学是关于世

界认识之历史的总计、总合、结论。列宁虽然把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强调起来，然而这是因为辩证法系由世界认识的历史中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他说：“辩证法就是认识的历史。”

上述列宁对于当作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对象所给与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说：第一，唯物辩证法与其它任何科学同样，有它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并且研究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不是从头脑里想出存在于各现象间的关系，而是要在各现象本身中观察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列宁的这种见解同少数派唯心论者把（事实上离开了具体科学及具体知识的）范畴的研究当做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少数派唯心论者企图建立一个从认识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实发展中游离了的各范畴的哲学体系，这样他们就事实上放弃了唯物辩证法。第二，各个科学分科（数学、力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及其认识之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各个科学的法则是狭隘地片面地被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所限制了。唯物辩证法则不然，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一般内容，及人类的其他一切科学认识之总计、结论、加工和普遍化。这样，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判断、和法则，是极其广泛的（包含着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法则，因此也包含着物质世界的本质的）各种规律性和规定。这是一方面，在这方面，它是宇宙观。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从一切空想、僧侣主义和形而上学解放出来的真正科学认识上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它同时又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真实性的方法论。我们说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唯

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这里更加明白了。这样对于否认哲学存在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者和庸俗化者的错误，也可以懂得了。

关于哲学对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使哲学脱离实在的现实，使哲学变为某种独立实质的东西。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而生长出来的哲学之必然性，反对单单以论理观念和论理观念的自身做研究的对象，如同形式论理学及少数派唯心论的那种干法。所谓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这种论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解说唯物辩证法为论发展的学说。恩格斯称唯物辩证法为“论自然社会及思维之运动和发展的一般法则”的学说。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他们都认为在这种学说以外的其他一切哲学学说所述一切发展原则的公式，概属狭隘的、无内容的、“截去了自然和社会之实际发展过程的东西”（列宁）。至于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被称为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原故，乃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最多方面地和最丰富地、最深刻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性和飞跃性，而不是因为别的东西。

在哲学对象问题中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的问题。

列宁着重指出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同一性，说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说“三个名词是多余的，它们只是一个东西”，根本反对那些马克思主义修正派把三者当做完全各别独立的学说去处理的那种干法。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

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

要彻底了解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三者为什么是一个东西，我们看下面唯物辩证法怎样解决关于论理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说：“对一切哲学家的思维方法来说，黑格尔思维方法的长处就在于横亘在根底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感，他的形式虽说是抽象的唯心论的，然而他的思想的发展却常常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的。并且历史原来就是思想的检证。历史常常在飞跃地错杂地进行着。因为有这两种情形，所以假若常常要依从历史的话，不但要注意许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会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断。这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论理的方法。然而这一论理的方法根本仍然是历史的方法，不过舍去了它那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罢了。”这种“论理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注意了。“论理学的范畴，是外的定在与活动之无数个别性的简约”。“范畴就是分离的阶段，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个网和网的结节点的”。“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类的意识几十亿次反复不息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论理学式子里面，这样，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谓公理的意义了”。“人类的

实践，反复了几十亿次，才当做论理的式子固定在人类意识中。这些式子，都有着成见的永续性，因为是反复几十亿次的结果，才有着公理的性质。”上述列宁的那些话，指明唯物辩证法的论理学的特点，不象形式论理学那样，把它的法则和范畴看成空虚的、脱离内容而独立的、对于内容无关心的形式，也不象黑格尔那样，把他看成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发展的观念要素，而是把它当做反映到和移植到我们头脑里，并且经由头脑加工制造过的、物质运动的表现去处理。黑格尔立脚在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上，把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同一性当做唯心论的同一性去处理。反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的。只有用唯物论的观点解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只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才能使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解决论理的东西和历史的東西的相互关系的最好的模范，首先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论理发展。资本论所分析的，是把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这问题之解决的唯物论性质，在于他以物质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畴当做这一现实历史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一致的门径。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对象问题。

五、物 质 论

马克思主义继续和发展哲学中的唯物论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彻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或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隶属于唯物论营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承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类出现以前它就存在，人类出现以后也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承认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拿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证据是多得很的。人类时刻同外界接触；还须用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外界（自然界同社会）的压迫和反抗；还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压迫和反抗——所有这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实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证据。经过了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

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不相同的。如果说哲学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研

究物质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等等，这些说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根据辩证法唯物论的见地去区别哲学的物质观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彻底贯彻哲学的唯物论方向之必须条件，在向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唯心论者根据电子论的发见，轰传物质的消灭的谬说，他们不知道关于物质构造之科学知识的进步，正足证明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之正确性。因为表现在旧的物质概念中的某些物质属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即电子论的发现，证明这些属性仅存在于某几种物质形态中，而在其他物质形态中则不存在。这种事实，破除了旧唯物论对于物质观念的片面性与狭隘性，而对于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之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却恰好证明其正确。原来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正是以多样性去看物质的世界的统一，就是物质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物质观，对于物质由一形态转化到另一形态之永久普遍的运动变化这一种事实，丝毫也没有矛盾。“以太”、电子、原子、分子、结晶体、细胞、社会现象，思维现象——这些都是物质发展的种种阶段，是物质发展史中种种暂时形态。科学研究的深入，各种物质形态的发现（物质多样性的发现），只是丰富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的内容，那里还会有什么矛盾？区别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有广狭之别，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广义的物质包括了狭义的物质。

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不承认世界有所谓非物质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

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统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即唯物辩证法见地）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论的见地内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有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切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切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

六、运动论（发展论）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物质论，即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种世界的统一原理，在前面物质论中已经解决了。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运动论（或发展论），即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统一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

（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观，对于（一）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二）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三）物质运动的简单化，都是不能容许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就是同这些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及机械的观点作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建立起来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首先是同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他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从所谓“世界理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周易哲学及宋明理学都作出唯心论的宇宙发展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说法都和辩证法唯物论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论与宗教，就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及现在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当他们说到自然现象时是唯物论的运动论者，但一说到社会现象时就无不离开物质的原因，而归着于精神的原因了。

辩证法唯物论坚决驳斥所有这些错误的运动观，指出他们的历史限制性——阶级地位的限制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运动观建设在以无产阶级立场及最发达的科学水准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论上面。辩证法唯物论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不是由外力推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把唯物的运动观同唯心的及唯神的运动观尖锐地对立着。

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则是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或绝对均衡论。他们认为物质是永远不变的，在物质中没有发展这回事，认为绝对的静止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辩证法唯物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一切的静止与均衡仅有相对的意义，而运动则是绝对的。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一切物质形态均有相对的静止或均衡之可能，并认为这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是辨别生命的最重要条件（恩格斯），但认为静止或均衡只是运动的要素之一，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静止要素或均衡要素夸张起来，把它掩蔽了并代替了全体，把运动的特殊情况一般化，绝对化起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家爱说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样的宇宙不动论。他们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现象的变动，但否认其本质的变动，在他们看来，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永远不变动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限制性。封建地主阶级如果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运动与发展的，就无异在理论上宣布他们自己阶级的死刑。一切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动论。革命的阶级同民众，却眼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原理，因而主张改造这个社会及世界，他们的哲学是辩证法唯物论。

此外，辩证法唯物论也不承认简单化的运动观，就是把一切的运动归结到一种形式上去，即归结到机械的运动，这是旧唯物论宇宙观的特点。旧唯物论（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十九世纪的德国费尔巴哈唯物论）也承认物质的永久存在和永久运动（承认运动的无限性），但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不去说他们在社会论上的见解依然是唯心论的发展，就在自然论上，也把物质世界的统一，归结到

某种片面的属性，即归结到运动的一个形态——机械运动。这种运动的原因在外力，象机械一样由外力推之而运动。他们不从本质上也不从内部原因上去说明物质或运动，或关系的一切多样性。而从单纯的外面的发现形式上，从外力原因上去说明它，这样在实际上就失掉了世界的多样性。他们把世界一切的运动，都解作场所的移动与数量的增减。物体某一瞬间在某一场所，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场所，这样就叫做运动。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增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变化是循环的，是反复产生同一结果的。辩证法唯物论与此相反，不把运动看作单纯的场所移动及循环运动，而把它看作无限的质的多样性，看作由一形态向他一形态的转化；世界物质的统一和物质的运动，便是世界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与运动。恩格斯说：“运动的一切高级形态必然同力学的（外的或分子的）运动形态结合着，例如如果没有热和电气的变化，化学的作用就不可能，如果没有力学的（分子的）、热量的、电气的、化学的变化等等，有机的生命也不可能，这当然是不能否认的。然而如果只有某些低级运动形态的存在，是决不能包括各种状况中主要形态的本质的”。这话是千真万确地合于事实。即使单纯机械运动而论，也不能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释它。须知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辩证法的，虽然它们之间的辩证法内容的深度与多面性有着很大的差异。机械运动仍然是辩证法的运动，所谓物体某一瞬间“在”某处，其实是同时“在”某处、同时又不在某处，所谓“在”某处，所谓“不动”，仅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状，它根本上依然是在运动。物体在被限制着的时间内被限制的空间内运动着。物体总是不绝地克服这种限制性，跑出这种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及空间的界限以外去，成为不绝的运动之流。而且机械运

动只是物质的运动形态之一，在实在的现实世界中，沒有它的绝对独立的存在，它总是联系于别种运动形态的。热、化学的反应、光、电气、一直到有机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质地上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大功劳，就在于发现了运动转化法则，指出物质的运动总是由一形态转化成为另一形态，这样地转化的新形态是与旧形态本质上不同的。物质所以转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由于外部机械力的推动，而是由于内部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因素相爭相斗，推动着物质的运动与发展。由于这个运动转化法则的发现，辩证法唯物论就能够把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扩大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上去，不但把世界当做永远运动的物质去考察，而且把世界当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无限前进运动的物质去考察，即把世界当做发展、当做过程去考察。做一句话来说：

“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就把旧唯物论的循环论击破了。辩证法唯物论深刻地多方面地观察了自然及社会的运动形态，认为当作全体看的世界之发展过程是永久的（无始无终的），但同时各个历史地进行的具体的运动形态又是暂时的（有始有终的），就是说，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并在一定条件下消灭的，认为世界的发展过程由低级的运动形态生出高级的运动形态，表示了它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但同时任何一个运动形态都不是处在永久的长流中（无始无终的长流中）。依据着对立斗争的法则（自己运动的原因），使每一运动形态总是较之先行形态进到了高一级的阶段，它是向前直进的，但同时就各个运动形态来说（就各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却也会发生转向的运动或后退运动，前进运动同后退运动相结合，在全体上就成为复杂的

螺旋运动。认为新的运动形态是作为旧的运动形态的对立物（反对物）而发生的，但同时新的运动形态又必然保存着旧的运动形态中的许多要素，新东西是从旧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认为事物的新形态新性质新属性的出现，是由连续性的中断即经过冲突和破局而飞跃地产生的，但同时事物的连结和相互关系又决不会绝对破坏。最后，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世界无穷尽（无限），不但就其全体来看是这样的，同时就其局部来看也是这样的，电子不是同原子分子一样表现着一个复杂而无穷尽的世界么？

物质运动的根本形态又规定根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科目。辩证法唯物论把世界的发展当作无机界经过有机界而达到最高物质运动形态（社会）的一个前进运动去考察，这一运动形态的从属关系就成了和它相应的科学（无机界科学、有机界科学、社会科学）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恩格斯说：“各种各类的科学是把特定的运动形态或相互关系相互推移的一联的运动形态拿来分析，因此科学的分类就在于要依从着运动的固有顺序去把各个运动分类排列起来，仅在这一点来说，分类才有意义。”

“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采取质地不相同的各种形式的物质的运动，因此也就不能忘记物质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个问题。所谓‘物质一般’与‘运动一般’是没有的，世界上只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物质或运动。‘物质’和‘运动’这些字眼只是一些简写的名词，在这些名词中，我们依照它们的共同特性是把各种不同的被感觉的事物一概包括在内的。”（恩格斯）

以上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运动论或世界发展原理。这个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

方法论，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的人们如果拿着这个彻底科学的武器，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

七、时空论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且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间和时间不能与物质相分离。“物质存在于空间”这句话，是从物质本身具有伸张性，物质世界是内部存在着伸张性的世界，不是说物质被放在一种非物质的空虚的空间中。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客观的，不存在于物质以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们以外。

把空间和时间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的这种见解，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见解。这种时空观，同下列几种唯心论的时空观是根本相反的：（一）康德主义的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人类的直觉形式；（二）黑格尔主义的时空观，认为发展着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日益接近于绝对观念；（三）马赫主义的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的种类”，“使经验和谐化的工具”。所有这些唯心论观点，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自身发展中反映着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些错的理论，都被辩证法唯物论一个一个地驳翻了。

辩证法唯物论在时空问题上，不但要同上述那些唯心论观点作斗争，而且要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特别显著的是牛顿的机械论，他把空间看作与时间无关系的不动的空架子，物质被安置到这种空架子里面去。辩证法唯物论反对这种机

械论，指出我们的时空观念是在发展的。“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便没有别的东西，而运动的物质若不在空间和时间中便无运动之可能。人类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相对的，但是这些相对的概念积集起来就成为绝对的真理。这些相对的概念不断发展着，循着绝对真理的路线而前进，日益走近于绝对真理。人类关于空间时间概念的变动性，始终不能推翻二者的客观实在性，这正和关于物质的运动形式及其组织之科学知识的变动性，不能推翻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一样的”（列宁）。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时空论。

八、意识论

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发展之一形式，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唯物主义同历史主义的意识论是和一切唯心论及机械唯物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根本相反的。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意识的来源，是由无意识的无机界发展到具有低级意识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人类。高级意识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着重指出意识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关系，和意识同人类言语发展的关系。

所谓意识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物质形态就是组织复杂的神经系统，这样的神经系统只能发生于自然界进化的高级阶段上。整个无机界，植物界和低级的动物界，都没有认识在它们内面或外面发生着的那些过程的能力，它们是没有意识的。仅在有高级神经系统的动物体，才具有认识过程的能力，即具有自内反映或领悟这些过程的能力。吾人神

经系统中的客观生理过程，是同它之内部取意识形式的主观表现相随而行的。凡就本身论是客观的东西，是某种物质的过程，它对于具有头脑的实体却同时又是主观的心理的行为。

特殊思想实质的精神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思想的物质——脑子。这种思想的物质是有特别质地的物质，这种物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言语的发展而达到高度的发展。这种物质具有思想这一种特殊性质，这是任何别的物质所不具备的。

然而庸俗唯物论者却认思想是脑子分泌出来的物质，这种见解歪曲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念。须知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行为，不是具有重量和伸张性的东西，意识同重量伸张等是同一物质之不同的性质。意识是运动的物质之内部状态，是反映着在运动的物质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同客观的神经作用过程不可分离，但又不与这过程相同，把这二者混同起来，推翻意识的特殊性，这就是庸俗唯物论的观点。

和这同样，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附和心理学中某些资产阶级的左翼学派的见解，实质上也完全推翻了意识。他们把意识解作理化的生理的过程，认为高级实体的行为之研究可以由客观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们不了解意识的本质之质的特殊性，看不到意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他们把客观和主体之具体历史一致代之以主客的等同，代之以片面的机械客观世界。这种把意识混同于生理过程的观点，无异取消了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哲学中的根本的问题。

孟塞维克的唯心论企图用一种妥协理论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论，把唯物论同唯心论调和起来。他们拿客观主义

同主观主义的“联盟”的原则，去对抗辩证法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既非机械的客观主义，也非唯心的主观主义，而是客观和主观之具体历史的一致。

可是还有怪议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关于意识问题的物活论的见解，在他的“石子也是有意识的”一句名言中充分表现着。照他的意见，意识不是发生于物质发展过程中的，而是从最初就存在于一切物质的，石子的低级有机体的，和人的意识之间，仅仅在于程度上的区别。这种反历史的见解，对于辩证法唯物论认为意识是最后发生的具备着质的特殊性的见解，也是根本相反的。

只有辩证唯物论的意识论才是意识问题上的正确的理论。

九、反映论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

关于物质能否被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切过去哲学都觉得无力对付的问题，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够给予正确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既同不可知论相反，又同直率的实在论不同。

休谟同康德的不可知论，把认识的主体同客体隔离开来，认为越出主体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和它的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可跳过的深沟。

马赫主义的直率实在论，则把客体同感觉等同起来，认为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成就了完成的形态。同时，他们不但了解感觉是外界作用的结果，而且不了解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觉机关和思想的脑子

中所做的改造工夫（取印象和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只有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肯定地答覆了可认识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根据这一理论，指明我们的印象和概念不但被客观事物所引起，而且还反映客观事物。指明印象和概念，既不象唯心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主体自动发展的产物，也不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客观事物的标符，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照象和样本。

客观的真理是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它虽然反映在我们的感觉和概念中，但不是一下子就取完成的形态，而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认为客观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取着完成形态而被我们获得的那种直率实在论的见解，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客观真理在我们感觉和概念中，虽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态，然而不是不能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的见解，认为意识是能够在认识过程中反映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印象概念上来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感觉和思维，并不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把我们同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我们同外界联系起来的，感觉和思维就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想的东西（印象和概念）并非别的，不过是“人类头脑中所转现出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在认识过程中，物质世界是愈走愈接近地、愈精确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刻地反映到我们的认识中。向着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作两条战线的斗争，揭破直率实在论和不可知论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

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认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度的，这和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种

见解根本相反。但我们之接近绝对真理，却每一次有其历史上的确定界限。列宁这样说：吾人知识之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是历史地有限度的。但是这一真理的存在是绝对的，我们不断地向真理接近也是绝对的。图画的外形是历史地有条件的，但这张图画描绘着客观上存在的模型则是绝对的。我们承认人的认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真理是不能一次获得的。但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又承认真理能够完成于人类认识的历史运动中。列宁还说：“对于自然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不要死板板地绝对地去了解它。认识不是无运动与无矛盾的，认识是处于永久的运动过程中，即矛盾之发生和解决的永久的运动过程中。”认识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运动，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见解。

一切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反历史的观点，都不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因此都带着狭隘性。感觉主义的经验论之狭隘性，在感觉和概念之间挖开了深沟。理性主义学派的狭隘性，则使概念脱离了感觉。只有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才彻底除去了这样狭隘性，把认识放在唯物的与辩证的地位。

反映论指出：反映过程不限于感觉和印象，也存在于思维中（抽象的概念中），认识是一个由感觉到思维的运动过程。列宁曾说：“反映自然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整体的反映，而是许多抽象的思考、概念、法则等等之形成过程。”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是飞跃式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精确地阐明了认识中的经验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关系之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许多哲学家都不了解认识的运动过程中即从感觉到思维（从印象到概念）

的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突变。因此，理解这一由矛盾而产生的飞跃式的转变，即理解感觉和思维的一致为辩证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宁反映论的本质之最重要的元素。

十、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观。

真理首先是客观的。在承认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之后，就等于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所谓客观真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知识或概念的内容之唯一来源，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论者否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一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才主张知识或概念是主观自生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内容，因而承认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然而这是不合事实的，任何一种知识或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它就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地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人类以改变环境为目的之一切实际行动，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行动也罢，其他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是受着思想（知识）的指挥的，这种思想如果不适合于客观的规律性，即客观规律性没有反映到行动的人的脑子里去，没有构成他的思想或知识的内容，那末这种行动是一定不能达到目的的。革命运动中所谓主观指导犯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真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都是错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不根据于正确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的妄想。有人说，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主观唯

心论者波格丹诺夫这样说)。照这样意见，那末宗教和偏见也是客观真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见虽然实质上是谬见，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认，有时正确的科学的思想反不及这些谬见的普及。唯物辩证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一切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与谬说是绝对对立的，判断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唯一的看它们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合乎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或革命运动中某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都只能把它当作谬说看待。

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是否认前者而承认后者。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不是片面地承认或否认某一方面，而是同时承认他们，并指出它们正确的相互关系，即指出它们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在认识客观真理时，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的。因为当我们说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这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对象是那个永久的绝对的世界。“关于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认识，就是永久的无穷的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绝对的”（恩格斯）。然而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在我们认识之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无数相对真理的介绍，而到达于绝对的真理。这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表现。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上，如果不经过程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唯物辩证法并

不否认一切知识之相对性，但这只是指吾人知识接近于客观绝对真理的限度之历史条件性而言，而不是说知识本身只是相对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历史地有限度的和相对的，但是科学知识跟谬说不同，它显示着描画着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就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见解。

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另一种是唯心论的相对论，对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相互关系问题都是不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根据于他们“物质世界无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认为人类思维也是不变化的，即认为在人的意识中这一成不变的客观世界，是一下子整个被摄取了。这就是说，他们承认绝对真理，而这个绝对真理是一次被人获得的，他们把真理看成不动的、死的、不发展的东西。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承认有绝对真理——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于他们不了解真理的历史性，不把真理的获得看作一个认识的过程。不了解所谓绝对真理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而每一步向前的认识，都表现着绝对真理的内容，但对于全部真理说来，它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能一下子获得绝对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关于真理的见解，表现了认识论的一个极端。

认识论中关于真理问题的再一个极端，就是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否认知识之绝对真理，只承认它的相对意义。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的发明，都不包含绝对真理，因而也不是客观真理，真理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既然这样，那末一切谬说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统治阶级剥削劳动群众，这些侵略主义与剥削制度也就是真理，因为真

理横竖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否认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结果，必然到达这样的结论。并且唯心论的相对论，它们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着要替统治阶级作辩护的，例如相对论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之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看来，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是唯心论的相对论，都不能正确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唯物辩证法，既给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问题以正确的解答，并且随之而来又确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再则，还同时给了绝对与相对真理以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259—273页。）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

前面简述了“唯心论与唯物论”及“辩证法唯物论”两个问题。关于辩证法问题，仅有概略的提到，现在来系统地讲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叫宇宙观），是辩证法的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叫机械的唯物论），这一点区别，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问题。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从古至今有三种主要答案。第一种是唯心论（不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辩证法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心造的，引申起来又可说是神造的。第二种是机械唯物论，否认世界是心的世界，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物质是不发展的，不变化

的。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推翻了前面两种，说世界不是心造的，也不是不发展的物质，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看世界，把世界在从来人眼睛中的样子翻转了过来，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大议论吗？这世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种议论，在西洋古代的希腊就有人说过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还只简单地笼统地说了一说，叫做朴素的唯物论，没有（也不可能）科学的基础，然而议论是基本上正确的。黑格尔创造了辩证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发展的，但是心造的，他是唯心发展论，其正确是发展论（即辩证法），其错误是唯心发展论。西洋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则是机械观的唯物论，他们说世界是物质世界，这是对的，就是象机械一样的运动，只有增减或位置的变化，没有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很不对的。马克思继承了希腊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改造了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心论，创造了从古以来没有过的、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论，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武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他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我们要系统地来讲唯物辩证法，就要讲到唯物辩证法的许多问题，这就是它的许多范畴，许多规律，许多法则（这

几个名词是一个意思)。

唯物辩证法究竟有些什么法则呢？这些法则中那些是根本法则，那些是附从于根本法则而又为唯物辩证法学说中不可缺少、不可不解决的方面、侧面或问题呢？所有这些法则为什么不是主观自造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则呢？对于这些法则的学习、了解是为了什么？

这个完整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学说，创见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发展了这个学说，到了现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与世界革命时期，这个学说又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这个学说中包含的范畴首先如下各项：

矛盾统一法则。

质量互变法则。

否定之否定法则。

以上是唯物辩证根本法则。除古代希腊的朴素唯物论曾经简单地无系统地指出了这些法则的某些意义，及黑格尔唯心地发展了这些法则外，都是被一切形而上学哲学（所谓形而上学哲学，就是反发展论的学说）所否定了的，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些法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之最基本的部分。

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范畴除了上述根本法则外，同这些根本法则联系着，还有如下各范畴。

本质与现象。

形式与内容。

原因与结果。

根据与条件。

可能与现实。

偶然与必然。

必然与自由。

链与环等等。

这些范畴，有些是从来形而上学哲学及唯心辩证法所着重研究过的，有些是从来哲学片面地研究过的，有些则是马克思主义新提出的。这些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手里，揭去了从来哲学唯心的及形而上学的外衣，克服其片面性，发现了它们的真实形态，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它们的内容，成为革命的科学方法论中重要的成分，拿这些范畴同上述根本的范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系统。

所有这些法则或范畴，都不是人的思想自己造出来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则。一切唯心论都说精神造出物质，那么，在他们看来，哲学的法则、原则、规律或范畴，自然更是心造的了，发挥了辩证法系统的黑格尔，就是这样去看辩证法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中抽取出来的法则，而是纯粹思想上的论理系统，人的思想造出了这一套系统之后，再把它们套到自然和社会上去。马克思、恩格斯揭去黑格尔的神秘的外衣，丢弃了他的唯心论，把辩证法放在唯物论的地位。恩格斯说：“辩证法的法则是从自然和人类历史抽取出来的，但它们并非别的，就是这两个历史发展领域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就实质论，可以归纳为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根本法则”。辩证法法则是客观世界的法则，同时也是主观思想里头的法则。因为人的思想里头的法则不是别的，就是客观世界的法则通过实践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是一个东西，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要

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类大多数都过着苦难日子，受着少数人所控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压迫。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的着人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性的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们必须改变这些老关系，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

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呢？因为辩证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我们明白它，就得到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方法。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做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法，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有人说，许多人懂得实际的辩证法，而且也是实际的唯物论者，他们虽没有读过辩证法书，可是做起事来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沒有特别研究辩证法的必要了。这种话是不对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实际上具有唯物的与辩证的头脑之革命者，他们虽从实践中学得了许多辩证法，但是沒有系统化，沒有如同已经成就的唯物辩证法那样的完备性与深刻性，因此还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捉住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学习辩证法的必要。

又有人说，辩证法是深奥难懂的，一般人沒有学会的可能，这话也是不对的。辩证法是自然、社会与思想的法则，任何有了一些社会经验（生产与阶级斗争的经验）的人，他就本来了解一些辩证法；社会经验更多的人，他本来了解的辩证法就更多些，不过还处在零乱的常识状态，沒有完备的深刻的了解，就将这种常识辩证法加以整理与深造，是并不困难的。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沒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中国许多辩证法书，不是错误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大好，使人人望而生畏。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这种书将来总是要弄出来的。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

以下分述辩证法的几个法则。

（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274——312。）

（原载《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第1卷第6、7、8期，现按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排印）

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八年初）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

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 请你再考虑一下, 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无暇, 我来看你。

毛泽东

(选自《中国哲学》第一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8月版, 第4页。)

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一九三七年九月)

我们所用的—切名词(或概念, 范畴), 例如“绝对”“相对”等等, 都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世界上有现实的马, 才有马的名词。相对, 绝对两名词, 也不是和现实事物离开的。

日常生活中常常有绝对主义在作怪。

例如信命运, 以为事情是不变的。又如认某处生活环境不适于己, 要求他移, 也以为环境是不能变的。又如认周围的人是不觉悟的, 不知道人也会变化。

黑暗不是绝对的, 光明也不是绝对的。

超过现实去追求理想的实现, 与逃避现实, 同是观念论。—切观念论中, 大部分都是绝对主义。

左倾幼稚病, 是一种绝对主义, 因为他们把理想看绝对了, 不知理想要按照当前实况才能实现。

黑暗的变动和光明的取得, 是和努力与否成比例的, 努力则然, 不努力则否, 这些东西的相对性, 是对于努力或不

努力而言的，是对于时间性而言的。

相对主义认为沒有一定的真理，一人一理，十人十理，“还不是差不多”。这是怀疑主义，一切皆移，无可把握。

怀疑是对的，怀疑一切是不对的。

老年人相对主义多，少年人绝对主义多。

相对主义夸张了事物的相对性。事物变动的相绝（对）性是应该承认的，夸张到无可把握，就成了相对主义。

承认事物的变动性，相对性，同时又承认变动中相对中的一些的东西，事物发展的一些的规律，在相对中承认绝对的东西。绝对包含于相对之中。相对主义不承认这种规律性。

相对的东西，包含着一定的绝对的东西，绝对的东西，是作为相对的东西的每一个必然阶级（段）而表现出来，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扬弃是：一方面把消极的东西抛弃了否定了，一方面又把积极的东西加以批评改作而保留下来，不是简单的抛弃。叶青说：“从前以形式逻辑支配一切研究领域，现在则把他局限在相对的静态中”。这样，我们否定形式逻辑，只能在他的应用范围上，而不能在他的质了，这不是简单的保留是什么？不是本质上承认形式逻辑和辩证有同等意义是什么？

（张友仁）

运动的东西，在空间的任何一点上，都是同时停留，又不停留的，这是运动的矛盾统一。叶青说：“运动是静止的积累，静止是运动的停留，两者相生相成，互为规定”。静止只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决不是运动的停留，运动（动）也决不是静止的积累，如果只是静止的积累，根本把运动解消在静止里了。（张友仁）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是最根本的问题。

辩证逻辑：A 是 A，同是（时）又不是 A，一件东西和他本身同一，同时又不同一。形式逻辑只看见同一这一面。辩证法则不仅看见这一面，又看见另一面（不同一），因此他能包摄吸收，扬弃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看不到的，辩证法能看到，形式逻辑看到了的，辩证法不但看到，而且加了改造与深化。

不能说：“一方面承认 A 是 A，另一方面又承认 A 不是 A”，就算是辩证法。这两个命题的关系不是所谓一方面与另一方面，而是同时，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结。是整个的统一，不是机械的结合，也不能机械的折（拆）散。如折（拆）散去看，就成了折衷主义。叶青的辩证法就是这种折衷主义的曲解。

叶青也承认归纳法演绎（绎）法是建立在形式论理学上，是要被辩证法扬弃的。然而他又说：“我们也可以在应用中，范畴地看待归纳法演绎（绎）法，而为辩证法研究过程中适当的场合。”这样承认整个研究是辩证法的，但在研究过程中有时要应用归纳法，演绎（绎）法，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就成为整个辩证法研究过程。

归纳法是从许多复杂的特殊事物中找出他们一般的单纯的共通点，采的路径是分析。演绎（绎）法是用一般原理说明特殊事物，采的路径是综合。前者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后者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照叶青的办法，整个的辩证法，不过将归纳法演绎（绎）法机械的折衷的结合起来而已。

照叶青说法，似乎辩证法的研究，也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他就是归纳法演绎（绎）法，其实是错的。

在辩证法，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中，虽用到普通归纳法里的观察，比较，分析等方法，但只作一个要素应用他。因为归纳法在这里只走着分析的路径，只从复杂事物中抽出简单的一面的规定。辩证法却不然，不只是分析，同时也在综合，即不只抽出简单的一面的规定，并要找出全面的矛盾统一的规定。

在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是不是只用演绎（绎）法，取综合路径，把一般法则应用到综合到个别事物上去就行了呢？不行的。如果要贯彻辩证法，就不单只应用法则，采取综合，在应用与综合同时，还要就那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具体条件加以分析，发现其新的特殊的矛盾动向。

不论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我们的方法根本都是辩证法的。归纳法演绎（绎）法只各自作为研究过程中的要素而被应用，不能离开另一要素而独立存在。他们并不简单地被抛弃，也不简单地被保留，而是被吸收，消化，改作。辩证法是整个的辩证法，不是归纳法演绎（绎）法拼凑成功的。

事物在量变过程中，他们性质不变，这时在性质说是相对静止的，然在量说始（终）在运动。因为相对的静止仍是绝对的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所以在相对的静止，仍然要用辩证法去研究，才会看得深刻。形式逻辑只能看见静止一方面，并且会夸大这方面，忘记根本的运动。既然有了辩证法能抓着事物的全面，连形式逻辑的一面也包括在内，为什么对相对的静止还要用形式逻辑去研究呢？

叶青说：“认识中国经济的性质，显然是静态的研究，因而问题的提出无疑是站在形式论理学上的”。

这是错的，这是折衷主义。照他的意思，只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才是动态的研究，是辩证法问题；形态，性质，

关系等只是静态的研究，应该属于形式逻辑，这不是明显的折衷主义么？

性质关系等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虽不能把它看作发展的本身，如果是忠于辩证法的，至少应从里面看出发展的动力，看出具体的矛盾，这是形式逻辑做得到的吗？形式逻辑只看见一面，只能成为公式主义。例如封建社会需要资本主义革命，这是公式。因为中国经济是封建经济，就说中国需要资本主义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演绎（绎），在形式逻辑是很通的，也只能如此说，然而中国的具体条件被抹杀了。中国的具体条件不允许限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革命，也不许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与此同样，形式逻辑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请出辩证法一途，从普列哈诺夫到叶青的公式主义，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二千年前希腊的诡辩论者，把运动看做空间中的无数停留点，于是结论说，只有无数停留点，没有运动。叶青说，静止是运动的停留，运动是静止的积累，这是诡辩论的还魂。

列宁说：“就是一个简单的判断，也是矛盾的统一，例如‘伊凡是人’这命题，就有着‘特殊等于一般’的意味。”形式逻辑也常说“青年是店员”这一类命题，而不说“青年是青年”，因为形式逻辑本身也不能严守同一律，否则他就建立不起来了。形式逻辑运用这一类命题时当然没有想到里面含有矛盾，因此不能说这是矛盾统一律的应用。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类的命题本质上包含着矛盾的统一。

艾思奇说：“差别的東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東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東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

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如只认善恶，男女，等等才是矛盾，其他不能转化为矛盾，这是形式主义的化分法，与张东荪划分‘相反，矛盾，对待’之为形式主义，是沒是（有）分别的”。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

排中律的公式“ A 是 B 或非 B ”，其实包含着这样的矛盾，即“ A 不是 A 而是 B ”，或者说“ B 可以是 B ，也可以是非 B ”，黑格尔早已这样批判过了。

外因不可忽视，却不能决定事物的必然性，决定必然性的是内因。叶青说：“须承认内因与外因的交互作用”，这是机械的交互作用，双方沒有高下的，这就形成了叶青的折衷主义。辩证法的交互作用则不然，双方有第一义第二义的分别。

承认叶青的问题：“机械需要外部的动力，水遇外部的热化为汽，生物进化由于环境，是不是事实”？并不简单的否定他。然而同时须承认事物变化的本身能动性，这是事物变化的决定的东西。机械有可动性，水有化汽的性质，生物有进化的性质，因此动力，热，环境等外因才能起作用。决定事物变化的必然性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

一般的東西，總是要以特殊的形式表現出來，世上沒有單純的一般存在物。所謂“一般之中有特殊”，是指取特殊形態表現出來的一般的東西，不是說有什麼獨立於一般之外的特殊東西（如象葉青所說內因論是一般原則，但中國的特殊性却不適用他，中國的發展是不合規律性的）。一般和特殊是矛盾的統一，沒有單純的一般，也沒有獨立在一般之外的單純的特殊。

辯證唯物論的特點，在於抓住事實的核心，事實的本質，事實的內部發展規律性，不在於尊重事實的表面。機械唯物論者，經驗論者，實用主義者也都尊重事實，都只尊重表面的事實。尊重表面事實，是認識的初步階段，是科學的初級階段，十七八世紀的唯物論，和機械的科學思想就是這樣的。不否認表面事實也可以給人以某些認識，十七八世紀的機械力學曾提供了許多真理，實用主義也比粉飾太平的空論家能多看到一點東西，能相當暴露敵人侵略的罪惡和絕對不抵抗的錯誤。然而單看見敵人的侵略，而不看見侵略的本質，單看見不抵抗的錯誤，而看不見民眾抵抗的前途，這種對眼前事實的尊重，與唯物辯證法是完全不同的。機械運動由於外力的事實，只是表面的事實，機械本身有運動的可能性，才是事實的本質。機械論時代的科學，只注意外力的研究，是因當時科學還在初期階段，還不能滲透到運動的本質中去。進到高級階段的相對論，使人對機械運動也知用內因去說明了。天體運動，牛頓時代只知用引力（外力）去說明，相對論卻用運動本身的性質去說明了。

（選自《中國哲學》第一輯，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79年8月版，第25—30頁。）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 游击战原则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同志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

（上略）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

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选自《人民日报》1981年7月7日）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 为唯一方向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给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电报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再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选自《人民日报》1981年7月7日）

《农村调查》序言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只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最后两部分，曾在中央苏区的《斗争报》发表过，其余保存原稿，经过长征，尚未损失。此外的东西，就都损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其一斑。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

(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论 鲁 迅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

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地准确，那样地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这是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选自《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选自《动员》第十期1937年10月23)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二月)

问：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见如何？

答：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战争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今后的形势必是

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现在正借钱打仗，除过去半年已经用去二十二万万元以外，今年一年的需要据说是四十万万元，必定还不止此数，这已经消耗他大量的国力。日本的国际信用降低，公债跌落，它的“速战速决”计划已经失败，试问他那有许多钱无限长期打下去？就军事方面讲，日本在中国的战线已经延长到自杭州已达包头的数千里的距离，他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所以他的兵力已随深入与扩大的程度渐渐薄弱。他占领了长距离的铁路，便需要军队去防守每一个车站，日本已动员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了，如果他再要占领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须再动员几十万军队，那时他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因为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加上日本国内国际的其他许多大矛盾，他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

问：先生说中国的力量能够渐渐加强起来吗？

答：根据过去七个月的作战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我的意见，在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人疲于奔命。至于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

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他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现在的成绩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起来。所有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加强，都是必须的。只要继续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强，这就预示着前途的光明。

问：第八路军在日人数面包围之中有被日人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呢？

答：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军在这里已经建立了脚跟，显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军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迫进津浦线。第二个区域是平绥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带。第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带。第四个区域是晋西南。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灭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问：先生觉得此次国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吗？

答：我以为是。在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同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然是长久的。

问：是的，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说过，国共两党不但共同抗日，并且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共同建国；请问这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将来怎能合作建立新国家呢？

答：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的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处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问：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

答：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

问：共产党对于目前的中央政府满意吗？还须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吗？

答：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他坚持抗战的方针

并领导抗战的行动。但我们希望加以充实和扩大，并在内政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加有利于抗战。我们曾经提出了临时国民大会这种主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倡过的，我们认为有益于团结全国加强抗战的力量。但究用何种方法更于抗战有利，我们并无成见，只要真正有利于抗战，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的。

问：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领导吗？

答：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问：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答：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对于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选自《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新华日报馆印行，1939年5月）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 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开了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了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见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亲手订的三民主义新纲领，已被通过于大会，那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如象刚才读过的总理遗嘱劈头一句所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间，经过了多少艰难

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的，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满清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加广大的，这个统一战线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这个统一战线所应执行的纲领，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东西，但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战胜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从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

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从芦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的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它党派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董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龄将军等数十万人就为着这个而牺牲了。判断日本法西斯是还要前进的，他还要进攻我们的西安、郑州、武汉、南昌、福州、长沙与广州，他想吞灭全中国。但是我要告诉那些发疯的敌人，你们的目的一定达不到。不要以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就算达到了你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也不会达到。你们日本法西斯的胜利，历史判定只会是暂时的，不会是永久的，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最后胜利只会属于我们一方面。而且战争打到结局，你们也一定只能占领我们的一部分地方，要占领全国是不可能的。即使你们得到了一个城市的

速决战，同时也就要你们得到一个乡村的持久战，例如你们把山西的几条大路与若干城市占领了，但数倍于你们占领地的乡村将始终是中华民国。我们要把这个理由告诉全国的同胞，日本差不多在任何一省都只能作部分的占领。日本的兵力不够分配，他的野蛮政策又激起了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有广大的军队与人民，中国又实行着统一战线的良好政策，就此决定了持久战以及最大胜利之属于那一方。将来的形势，双方血战结果，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半，中国只剩下完整的小半作为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中枢根据地，但在那大半地方，实际上日本只能占领其中的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地，只要我们能够在全省中组织大多数乡村中的人民一致武装起来打日本，建立许多抗日根据地，如象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的五台山根据地一样，我们就包围了日本军。我们的这个外线的战争，配合着内线的战争，又从各方努力把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党、政、军、民各项紧要工作办得大大进步起来，有朝一日，就可互相配合，内外夹击，打大反攻，那时，还一定会配合着世界革命的援助同日本国内人民革命的援助，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谁能说是白流的呢？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能说不是必然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大理想，谁能说不会实现于中国的？我们要使全国人民都有这种明确的认识与坚固的信念；都懂得最好的持久战方针，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下，在这回大战中，齐心协力，一定要把亡国奴或亡国奴威胁的锁链摆脱掉。

在这个大会上，我们要向一切在前线奋战的将士们致敬礼，因为他们都在为着最后胜利作英勇的斗争；我们要向一切抗日军人的家属尤其是死难烈士的家属致敬礼，因为他们

家中出了这样为国奋斗、不怕牺牲的抗日军人；我们也要向在后方各界辛苦焦劳、刻己奉公以从事于抗战工作的各级工作人员与各级领袖们致敬礼，因为他们的工作都直接指导了或帮助了抗战。在这个大会上还要让我们特别向我们的民族领袖、抗战统帅蒋委员长致敬礼，因为领导全国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发动并指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大会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让我们永远的团结起来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选自《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

新华日报馆印行，1939年5月）

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致项英同志）

项英同志：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

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下略）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批1957年9月）

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

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

雷克难先生之谈话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第一个问题：目前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明白这点。

答：明白了边区的性质，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首先，在民众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则下，都有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自由职业者的团体都有这种自由。共产党与边区政府从而积极地扶植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更普遍地发展下去。这里仅仅限制汉奸的活动，对于汉奸，是不给任何自由的。

其次，边区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区域，这里留了八路军的

一部分，还有地方武装部队。这些军队，其内部官长与士兵的关系，其对外与人民的关系，也都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能够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使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能被战胜的力量。

其次，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你们从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就可看出这种精神。

其次，经济方面也是这样，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例如这里颇为发达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农民之于农业，都是按照这种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时又有利于抗日事业。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符合于上述的主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说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农民，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而有效。与过去苏维埃不同的是推广了选举与被选举的范围，即不论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学生、商人、有产者，只要不反对抗日而年满十八岁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以上所述的各方面，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都能取得很大的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那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

这就是边区的性质，边区的特点，明白了这种性质与特点，就可以明白它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了，全国也应

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结合，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这种制度要全国采取，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所以我们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来看的人也不少，青年学生尤多，除了少数人说这种制度不好之外，大多数人都是说好的，这是可以引为庆幸的事。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

现在有些人对于边区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说边区什么都不好，有少数顽固分子这样说，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说这里象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都没有，这种说法也过分了。正确的说应该是这样：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值得供全国人民仿效与参考。但这里的工作还受某些条件的限制，例如，物质困难即其一例，许多工作还得继续努力，方能更好，并不是样样都好得不得不须再求进步了。因此，欢迎外界的批评，加重了这里工作人员的努力，这也是要指出的。承诸位好意来延安参观，我就欢迎

诸位的批评，指出这里的缺点，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利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坚持抗战？妥协还是坚持抗战，这是存在的问题。我们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们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绝不动摇，直至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为止。

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结，才能坚持抗战。现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结，但还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结在一定的组织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才算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

什么叫做坚持持久战？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说：“中国会亡，不能作持久战。”另一种人说：“中国很快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也无需于持久战。”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首先，中国决不会亡。理由是日本虽强，但它先天不足，国内外矛盾很多；中国虽弱，但是国大，又有许多国内外的优良条件。因此，中国虽在战争的一定的时期损失了许多地方，但仍能坚持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要很快的打胜日本也困难，因为虽有争取胜利的可能条件，但不能很快的全部的实现，这不论中国的进步也好，日本的内溃也好，国际的援助也好，都非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应准备长期战争，不能希望即刻胜利。

这样，现在的方针应该是：第一坚持抗战，第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第三，坚持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干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干的这些事情。中共愿与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起来，一定要把这个方针贯彻下去，这就是中共在全国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呢？

答：要缩短战争时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的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统一战线的方针下，各项工作须大大的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争期间就能缩短一分。第二个条件，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现在这种帮助已经开始，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争传单，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中。如果日本的士兵和人民更多的觉悟一分，战争期间也就可以缩短一分。还有一个条件，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我们需要世界学生的帮助，需要世界人民的帮助，也需要各国政府的帮助。如这些帮助更多更快，那末我们的战争也就会缩短。这三个条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快团结，就能使日本国内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帮助我力量加快发展。如果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我们国内的抗日力量加快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更大的打击，也就是给了日本人民的帮助，将使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发展更快。对世界也是一样，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这三个条

件多具备一分，则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及全体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日本及世界各个先进政党与全体人民的任务。我们的战争是持久战，但我们应极力争取尽可能缩短时间的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缩短时间只是空想。

第四个问题：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

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相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民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在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希望所力争的，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力争的。进行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

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系。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等。在抗战中，是要具备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先决主要条件，目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五个问题：你以为现在中国的学生及青年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世界学生与青年在援华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中国青年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的任务，与前面所讲的相同，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任务，没有什么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其特殊的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组织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组织救亡团体的权利，十八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贫苦学生有免费入学之权，青年应大批上前线等等。说到世界青年们帮助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我想，首先是经过世界学联，使世界大多数青年与学生了解要共同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是使他们了解这种工作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联系的。因为和平不可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其次，学生是联络人民的桥梁，经过学生，使各民族的人民懂得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以及这种工作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关系。至于具体的帮助方法，例如用口头和文字作宣传，劝告人民与政府给我们的物质上帮助，不买日本货与不卖货给日本，直至组织国际抗日义勇



2 020 3920 3

军，准备于适当时机来华参加战争等等。诸位代表着广大的国际学生团体来华视察，给我们以广大的同情，全中国人都感谢你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把中国伟大抗日战争的真相带给世界学生与人民。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

（选自《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
新华日报馆印行，1939年5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毛泽东哲学思想资料选辑（上册）

作者=数据库无信息

页数= 2 7 6

S S 号= 1 0 2 3 0 9 0 5

出版日期= 1 9 8 2 年 1 0 月第 1 版

出版社=北京大学哲学系

封面页	
书名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代序	学习毛泽东&周恩来
读《明耻篇》后题词	(一九一五年)
体育之研究	(一九一一年四月)
民众的大联合	(一)(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民众的大联合	(二)(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民众的大联合	(三)(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给陶毅的信	(一九二〇年二月)
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周世钊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为易礼容的信加的按语	(一九二〇年七月)
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
给肖子璋的信	(一九二〇年×月)
肖子璋给毛泽东彭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给欧阳泽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欧阳泽给毛泽东彭璜的信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给张国基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
给向警予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向警予给彭璜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
给罗荣熙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罗学瓚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给罗学瓚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罗学瓚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罗学瓚给毛泽东蔡林彬肖子璋的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给罗漱阶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罗漱阶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给李思安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李思安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肖旭东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
给蔡和森的信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二号)(一九二一年一月)
北京政变与商人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省宪经与赵恒惕”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纸烟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英国人与梁如浩（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节录）（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录）（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
东唐等处调查（节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木口村调查（节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兴国调查（节录）（一九三〇年十月）
寻乌调查（节录）（一九三〇年五月）
今年的选举（节录）（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长冈乡调查（节录）（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才溪乡调查（节录）（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一九三四年四月）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一九三七年七、八月）
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八年初）
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一九三七年九月）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农村调查》序言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
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和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付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附录页